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馆刊
总第九期



2013.8

目 录

Contents

研究与探索

- | | | |
|----|----------------|-----|
| 4 | 我参与办理的李燕娥后事及其他 | 李家焯 |
| 9 | 宋庆龄与音乐剧《孟姜女》 | 宫洁菁 |
| 15 | 宋庆龄与足球的故事 | 傅 强 |

馆建工作

- | | | |
|----|---------------|-----|
| 18 | 微博营销经典案例的启示 | 许毅捷 |
| 20 | 履行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 | 夏义坤 |

宣教论坛

- | | | |
|----|-------------------------|-----|
| 23 | “宋庆龄 1963 年迁居（长住）北京”说质疑 | 胡 炎 |
| 26 | 解读“三公里文化服务圈” | 傅 强 |

陈展天地

- | | | |
|----|-------------------|-----|
| 31 | 优雅·时尚——馆藏宋庆龄服饰展漫谈 | 麦灵芝 |
|----|-------------------|-----|

馆藏研究

- 37 关于几张馆藏照片的考证 郑培燕
41 宋氏墓地变迁略考 王宁宁

文保之道

- 48 谈纺织品的保存方式与陈列提用 徐建华
53 故居文物保护工作中的白蚁防治 毛正东
56 库房搬迁札记 花婆婆

藏书选译

- 61 《最后的女皇
——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选译（连载） 宫洁菁

资讯快车

- 70 故居新闻

图版

宋庆龄服饰

我参与办理的李燕娥后事及其他

口述 / 李家炽 整理 / 王宁宁

【整理者按】2013年2月，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家炽捐赠我馆一份珍贵的书信，该信为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杜述周1981年2月寄给李家炽的原件，内存有宋庆龄给杜述周的指示复印件，宋庆龄给杜述周的指示原件现藏于北京宋庆龄故居。在这封信中，宋庆龄将李燕娥的后事全权委托给李家炽，可见宋庆龄对他的信任。李家炽终不负所托，圆满处理了李燕娥的安葬问题，是为最了解此间过程的当事人。本文根据2013年6月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一、我与李燕娥的交往

首长在北京居住时，李燕娥就在上海帮首长管家，应该说和我见面的机会多一些。有时候，春节到了，我会去看看她。她一个人很不容易。那时候我在机管局工作，办公在康平路市委机关，与故居很近，转个弯就到。1980年大年初一我就去了，记得那天我早上起来，在家里吃好早饭到市委机关去，看望门卫、烧热水汀的师傅、炊事班烧早饭的

同志和电话中心的女接线员同志，他们都是头一天晚上（年三十）值班的，此时还没有交班，非常辛苦。我应当去慰问他们，祝他们新年好。看望好他们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我在办公室喝杯水休息一会，就到首长家里去，看看李燕娥，看看值班的师傅和门卫，李燕娥当时非常高兴，说：“你大年初一来看我哦！”我说：“应当的哦，你在这里这么多年，每天都在，也很不容易。”我们两个人在院子里说了一会儿话，她那会儿已经安排厨师唐师傅给我做了一份炒年糕、烧了一碗汤，她问我：“你稍微吃一点好不好？”我说：“一定吃，一定吃！”她很高兴。

二、李燕娥病重

1979年，李燕娥因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在上海华东医院诊断患子宫癌。华东医院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说这个病光开刀不行，还要化疗。这就遇到了困难，医院领导说化疗需要用到“钴60”，上海只有华东医院一家有这个机器，

但是因为李燕娥腰围过粗，进不去这个机器，这就成了问题。医院领导说不能治疗也无法开刀，上海其他医院没有这个机器，实在没有办法。我就给市里领导汇报，市里领导让我给首长直接汇报。4月9日，我用电话简短地告诉杜述周秘书，然后又写了一封信正式汇报。后来首长给我指示，让我马上把李燕娥送过去，我立刻订好机票，4月17日，我负责把她送过去。随行的还有首长在华东医院的特别医生胡允平和特别护士盛学素两个人。首长都已经交代好了有关医院，飞机下来就送到301医院去了。这样子把她送到北京治疗的事情就告一段落。在北京医院治疗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就派人送回上海来了。1980年3月，李燕娥病情复发。首长交待我，不要叫我们这样去送了，她直接派一位姓陆的同志来接。首长先叫这位姓陆的同志到我家来看看我，并且带来一袋水果给我，我非常感动。宋庆龄做事情就是这样，对待工作人员很关心。3月27日，李燕娥被接走了，但在北京治疗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三、办理李燕娥丧事

1981年2月5日，李燕娥过世。这天是年初一，正值春节假期，为了不影我过节，首长交待杜述周春节不要打电话告诉我，到春节以后再打。年初四我到市委机关上班，一早就接到杜述周交待李燕娥后事的电话，杜述周说“首

长要你来办，你马上就来”。我第二天就去了北京，到北京后，首长精神、身体都不好，李燕娥过世对她影响好大，她认为李燕娥比自己亲人还亲。我现在还保留着这份首长指示我办理李燕娥后事的信件，这是复印件，因为当时原件是给杜述周的。这封信里把首长给杜述周的指示（复印件），还有包括首长的意思都在旁边标注了一下。“机要”当时把信寄到机关来，信收到的那一天正好杜述周打电话给我。

首长让我们不要再去搞墓地，不要再多去花费什么，就在她父母的墓地安葬李燕娥，这样最好。也许大家都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办法，但她就想到了。在交待李燕娥后事时，她还谈到了自己的后事。她自己也要安葬在这个家族墓地中。因为这是她父母亲过去和6个子女约定好的，约定好6个人兄弟姐妹都要和父母安葬这里。对家庭来说，团圆最重要，当然由于历史的客观因素不能在一起，最后只有首长一个人和父母亲安葬在这里。

李燕娥安葬的墓地图纸弄好以后，要拿到北京交予首长审阅。杜述周虽让我过去，但当时首长身体不好，发高烧，无法见我。我那时工作很忙，还要回上海办事情，没有办法在北京一直等，正好沈粹缜大姐与我关系蛮好，她当时一段时间都在北京（她有两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我就委托她在见到宋庆龄时把墓地的事情代为请示汇报（共有两次）。

这样我就回上海了。

李燕娥的骨灰是我带回来的。当时首长身体不好，没办法，就交待由我亲手带回去负责安葬。她深深地怀念着李燕娥，说“她是最亲密的同志，五十多年，比我亲戚还要亲，安葬好了，我要看一张照片”。当时首长非常着急，希望能够早点办好，但是实际没有办法那么快。因为墓地要准备，特别是墓地里的石头要撬起来，里面还要装石头盒子、新立墓碑、刻字等等。她的心意我们了解，希望早些入土为安。但我们要尊重客观，要准备得妥当。其实我们也想到，就是要尽量赶在清明前落葬最好，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传统习俗。

李燕娥的墓在宋庆龄父母合葬墓前方的西面，东面准备给宋庆龄做墓地。李燕娥的墓碑上首刻着“一九八一年二月”，中间刻着“李燕娥女士之墓”，落款是“宋庆龄立”。4月2日上午九点我来到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为李燕娥举行安葬仪式。参加安葬仪式的除我之外，还有市政府秘书长张甦平、市政府行政处科长戴炳书（曾经在上海宋庆龄寓所做过管理工作）、寓所管理员周和康、厨师唐江、司机刘春生、绿化工沈根林等人。当时李燕娥墓地前有宋庆龄、张甦平和我三人献的花圈。安葬仪式上我做了主持讲话：“李燕娥大姐勤勤恳恳，为首长服务了50多年。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争年代非常的环境下，不管多么困难，她都是忠心耿耿。李燕娥大姐

像首长的亲人，她一心服务好首长，的确很不容易。首长要感谢她，我们要感谢她，要学习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安息吧！”最后我们向李燕娥墓地三鞠躬，围绕她的墓地瞻仰了一周就告别了。举行安葬仪式时，上海文汇报记者徐大纲来拍了照片。落葬后，我马上回到机关，把安葬时讲的一篇讲话稿和安葬的一套照片都寄给首长。首长看后还是比较满意的，当时她写信向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上海市市长汪道涵表示致谢，因为这不是我一人办的事，而是上海市领导都重视才能把事情全部解决得圆圆满满，我记得宋庆龄的书信集中有宋庆龄就此事向市委领导致谢的信和向我致谢的信。



▲ 李燕娥墓地

四、李园缘何没有参加葬礼

在我收到的杜述周转交的“宋庆龄关于李燕娥安葬的指示”的信封上，明确写有“又示①不告李园骨灰在上海了②不告李园葬在何处”。这一指示是根据首长写的“这件事在上海不要让人知道好！特别是安葬前！”这一指示所特别补充的。

李燕娥有一个养女，是宋庆龄家里原来的工作人员谭明德的女儿。因为领养时小孩子已经大了，而且平常也不住在一起，因此缺乏母女之间亲密的感情。李燕娥过世，国务院机管局送了500元给李园（因为李燕娥的工资是宋庆龄自己给的，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首长送了200元给她。当时李园准备结婚时，首长考虑比较周到，要我们帮她解决一间房子，市里机关就给她解决了一小套房子。李燕娥在过世之前，也曾为李园结婚准备了一些钢盅锅、钢盅茶壶、热水瓶等一些生活器具。在李燕娥安葬后，我和周和康到李园结婚后的新房去看望他们夫妇，把这些东西全部交给她，同时把钱也给她，她在这时知道了养母安葬的消息。首长不让告诉她大概是顾虑到一些社会影响（尤其在上海）。因为大家都已是成人了，生活已都能自理。万一她去到处讲妈妈葬在宋家墓地里，影响不太好。如果把这件安葬的事情处理得圆满，将来她就不会找首长。我是这样想的，首长就是要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周到。

五、处理李燕娥后事过程中 接到准备首长后事的命令

1981年3月下旬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机关事务座谈会，在会议闭幕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有一位高登榜副主任要我留下来，他说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冯文彬要找我谈话。会议一结束，高登榜副主任就陪我去人民大会堂上海厅去谈话。这时就谈到首长的病情，要上海做好准备。当时首长已经88岁高龄，而且罹患白血病，中央从全国各地包括海外能够想的办法都已用过，但是老人可能说不行就不行。冯文彬让我回去就要向市里领导汇报，准备宋庆龄的安葬问题。宋庆龄逝世要按国葬办理，三天在京公祭，第四天开追悼大会，第五天到上海安葬，不能改变。

在处理首长的安葬问题时，中央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由廖承志、高登榜主持，主要是邓大姐在抓这个事。廖承志当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宋庆龄会把李燕娥安葬在自己家的墓地内呢？在这里有一段故事，马克思家里有一位老佣人，照顾他们家几十年，后来这位佣人去世了，马克思就决定把老阿姨安葬在自己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里面买好的家族墓地里。因此首长也是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做，永远跟劳动人民在一起，不要忘记劳动人民。我觉得这些思想都非常高尚和伟大。

六、首长病危时的一件小事

1981年4月起，我就常驻北京饭店，当时沈粹缜大姐也住在北京。5月14日晚上，首长病危了，杜述周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快来首长家里。沈粹缜知道后，决定跟我一道去。杜述周派汽车来接我们到首长家里，这时就走不成了，因为随时要办一些事情。15日一早，我就遇到了一件比较着急的事情。医生认为首长的营养跟不上，希望上海可以提供一些北京买不到，上海有可能有的营养品，因为光吊针不行，他希望可以提供更多的营养。当时医生问我能不能买到一些鸡精，这个在北京没有卖的。当时改革开放没有多久，我也不确定上海有没有，我说我马上去想办法，但也无法保证。我马上打电话给市政府秘书长张甦平。我有些担心，问上海有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据我了解上海没有看到过，他蛮好的，让我放心说：“上海没有，上海在香港有办事处，让香港的办事处来买”，我说：“太好了，那我就只需要等着了”。他说：“我马上打电话，让上海香港办事处马上来办，如果今天下午能拿到，今天下午就到北京”。到吃好中饭以后他打电话给我，说鸡精已经买到了，告诉我下午两点多钟有一个民航班机到北京，班机号也都告诉我，让我到班机上去找机长拿。因为我没有办法直接进到

飞机场里面，就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请他帮助。他说可以，并且派了一位保卫部门的人和我一起去机场。这样路路都通了，一直到找到机长。我问：“机长，上海带的东西你带到了么？”他说：“带到了，带到了。”他问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一报，他说：“应当交给你。”我说：“多谢多谢，因为等着要急用。”他说：“理解、理解。”这样就拿回来了，医生很高兴，说到底还是上海办事情，快得很，几个钟头就解决了。我说这是上海应当办的。可是这样仍然解决不了这个病情的发展，因为高龄，这些营养加起来也无济于事。1981年5月29日，首长辞世，安葬在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内。

现在首长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首长与李燕娥并非姐妹，却情同姐妹，让我感触良多，希望通过我的回忆让这份情谊一代代传递下去。



▲ 宋庆龄安葬后的宋氏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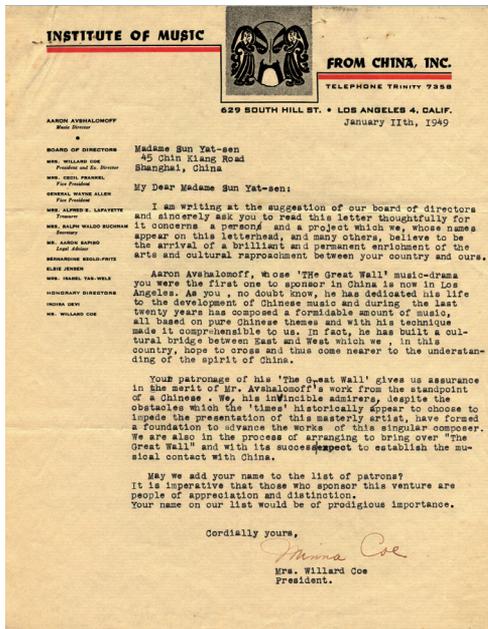
宋庆龄与音乐剧《孟姜女》

撰文 / 宫洁菁

1949 年的一封来信

1949年1月11日，威拉德·科夫人（Mrs. Willard Coe）致信宋庆龄，信中，她郑重地告诉宋庆龄，她所领导的“洛杉矶中国音乐协会”即将克服各方阻力，在洛杉矶重排俄籍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的音乐剧《孟姜女》（“The Great Wall”）；并言辞恳切地希望宋庆龄同意让他们把她的名字列在这次演出的赞助者名单中。

不久之后，宋庆龄便写了回信。信的内容已经全文发表在本馆出版的《馆藏宋庆龄书信选编》中。宋庆龄态度鲜明地对威拉德·科夫人的邀请表示了拒绝，称“我遗憾地告知你，我无法与你们一起做这件事，因为我的机构正在组织安排来自美国的对它的各个项目的广泛支持。使用我的名字和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发出呼吁很可能造成混乱。因为不想以任何形式妨碍我们的朋友在那边所做的巨大努力，所以我必须拒绝这个要



▲ 威拉德·科夫人致宋庆龄信

求。”^[1]

本馆所藏的宋庆龄书信都是底稿或者抄件，不是实际寄出的信，所以这封信后来是否又经修改，甚至是否寄出，都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宋庆龄本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断然拒绝，没有

商量的余地。

宋庆龄素来对文艺界的工作持鼓励态度，对于将中国的文化宣传到国外更是大力支持，何况近三年前，即1946年3月，她曾一手促成《孟姜女》一剧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盛况空前的义演。既然如此，为何对于《孟姜女》1949年在美国上演一事宋庆龄会如此排斥；《孟姜女》一剧是如何与宋庆龄结缘的；她在信中所说的“不想以任何形式妨碍我们的朋友在那边所做的巨大努力”是指什么。笔者就此进行了一番考证。

1946年宋庆龄主持的义演

1946年3月27日至28日，宋庆龄为她发起设立的作家艺术家“文化福利基金”邀请中国歌舞剧社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义演音乐剧《孟姜女》。当天，宋庆龄亲自到场主持，并邀请宋美龄、孔祥熙以及驻沪美军司令魏德迈观看演出。出席义演的还有各国驻华使领馆外交官，外侨，工商、实业、金融各界的巨贾名流等。

两场演出共收入8000美元，全部作为文化福利基金，分配给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木刻艺术家协会、中国音乐协会、中外文学联络协会、中国学者学会等十个进步文化团体，救济贫困文化人。为庆祝演出成功，义演结束后，宋庆龄还特地给演出人员每人颁发一枚《孟姜女》演出纪念章和一本封面上有她英文签名的《孟姜女》英文说明书。

这次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不仅

因为《孟姜女》本身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剧”，更因为其豪华的观众阵容。上海的各大报纸都竞相报道当时的盛况，谓“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孔祥熙氏及孔二小姐，于昨晚八时半至兰心大戏院观歌剧‘万里长城’^[2]，孙、蒋两夫人并肩坐于楼上中间，孔氏及孔二小姐坐稍远。其余盟军高级军官、苏联武官、苏联外籍职员到者甚众……”

值得一提的是，3月27日宋庆龄还以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的名义撰写《中国福利基金会简介》一文，刊登在《孟姜女》说明书卷首。她在文中阐明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宗旨、性质和任务，并表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开展各项救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把募集到的款项、药品和其它物资，援助给迫切需要帮助的人们，它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将继续保持同国际救济和福利机构紧密的联系和可靠的合作，为援助中国提供帮助。”

可见赞助《孟姜女》在兰心大戏院的演出，是宋庆龄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又一次筹款援助行为。宋庆龄的目的是把演出所得款项捐赠给在战争中受到摧残的中国的作家、艺术家，鼓舞他们去恢复和发展国家战后的教育和文化事业。

那么《孟姜女》到底是怎样一部音乐剧，它缘何能得到宋庆龄的垂青，宋庆龄是如何与该剧的创作方中国歌舞剧社建立联系的。笔者进一步进行了梳理。

最初的音乐剧《孟姜女》

《孟姜女》，英文名为《万里长城》（“the Great Wall”），是俄籍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创作并导演的。他1895年出生于西伯利亚的尼古拉耶夫斯克，自幼迷恋中国的乐曲和戏剧，成年后长期定居中国，开展创作，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开拓者之一。

阿甫夏洛穆夫一生写了几十部以中国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有歌舞剧《观音》、交响诗《北平胡同》、舞剧《古刹惊梦》，等等。他的主要功绩是呼吁中国作曲家在学了欧洲乐器和配器之后不要使他们的作品“西方化”，而是要用他们学到的这些东西来表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音乐传统。他竭力主张用西洋音乐的创作技巧提高并扩展中国戏曲音乐的表现力，将京剧等戏曲的唱腔部分改编为歌剧形式，以传统京剧中的做、打等部分发展出独立舞剧，并创立一种包括歌、舞、对白在内的，不同于京剧的新型中国音乐剧。而音乐剧《孟姜女》就是他这些主张的最佳贯彻，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40年代初在上海努力实现自己音乐理想的阿甫夏洛穆夫正处于失业潦倒、壮志未酬、进退维谷的尴尬境遇，此时他结识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姜椿芳。姜的身份特殊，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文化界的负责人之一，为帮助阿甫夏洛穆夫排练《孟姜女》，他组织同乡袁励康、

江闻道等音乐爱好者集资成立了“中国歌舞剧社”。剧社解决了《孟姜女》上演的经费、演员、排练场所等各个问题，促成了1945年11月25日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的首场正式演出。

然而，由于《孟姜女》反暴政的故事情节有影射国民党当局独裁的嫌疑，再加上中国歌舞剧社的“复杂”背景，国民党某些官员开始阻挠演出的继续进行。社长袁励康无奈之下，便向宋庆龄请求帮助。宋庆龄这时恰好正在筹设救济贫困作家、艺术家的“文化福利基金会”，便表示愿意出面主持《孟姜女》的演出，条件是将演出所得作为基金会的赞助款，中国歌舞剧社自然应允。

于是，在宋庆龄的大力推动下，《孟姜女》得已于1946年3月27日、28日再次登台上海兰心大戏院，并且宋美龄、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都亲临观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果。

可见，宋庆龄支持音乐剧《孟姜女》上演显然不仅是出于对阿龙·阿甫夏洛穆夫的音乐才华的欣赏，更是与她所从事的救济工作有着直接关系。

《孟姜女》的发展与谢幕

宋庆龄赞助的此次演出取得了出色的效果，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后来《孟姜女》的“变化”。

如前所述，驻沪美军司令魏德迈等高级美军将领受宋庆龄之邀一起观看了《孟姜女》的演出，令众人意外的是，

美国人对这场用西洋乐器演奏的中国音乐剧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该剧如东渡美国演出必将受到欢迎。当魏德迈把这个提议告诉蒋介石之后，国民党内部便开始蠢蠢欲动，一场“变革”由此开始。

宋美龄、孔祥熙等想尽力促成《孟姜女》赴美演出一事，但中国歌舞剧社的左翼背景是他们无法容忍的。为此，孔祥熙等人决定重组剧社，并坚持在赞助者名单中去除掉所有由左翼艺术家组成的团体。而作为《孟姜女》的创作者阿龙·阿甫夏洛穆夫，有机会使自己的作品让更多更广泛的人接受，是他一个音乐家所梦寐以求的。何况他只是一个外国人，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因此他答应了与国民党合作，加入了由国民党组建的新的创作团体。

随后，音乐剧《孟姜女》便在国民党的主导下继续在国内进行了数场演出，声势浩大。当然，演出遭到了左翼文艺力量的批判和抵制。

然而1947年以后，国民党还未来得及将《孟姜女》带去美国，国内的战势就已经使他们无暇顾及这件事情了，轰轰烈烈的赴美演出计划就此流产。无奈的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不愿放弃希望，于1948年亲自去美国联系演出事宜。

由前文所提威拉德·科夫人1949年1月写给宋庆龄的信可知，阿龙·阿甫夏洛穆夫赴美之后确实对推动《孟姜女》一剧的上演进行了极大的努力，威拉德·科夫人的洛杉矶中国音乐协会就是被他

说服和打动后，愿意提供帮助的一个团体。但不知是何原因，最终还是未能成功，阿甫夏洛穆夫就此滞留在了美国，想重返中国的努力也终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而付之阙如。这位对中国现代音乐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俄籍作曲家于1964年在贫病中客死纽约，而《孟姜女》一剧也就此进入了历史。

综上，宋庆龄与音乐剧《孟姜女》的渊源始于1946年3月那两场演出，也止于那两场演出。因为此后，该剧已被国民党强行接手，走向了另一个舞台，出于各种原因，宋庆龄便未再过问。

宋庆龄拒绝赞助义演的原因

1949年初威拉德·科夫人愿意支持《孟姜女》一剧在美国上演，为了增强演出的影响力，力邀宋庆龄参与赞助。但宋庆龄以“我的机构正在组织安排来自美国的对它的各个项目的广泛支持。使用我的名字和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发出呼吁很可能造成混乱。不想以任何形式妨碍我们的朋友在那边所做的巨大努力。”为由表示了拒绝。

一个月后宋庆龄在给友人杨孟东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关于要我赞助《孟姜女》一剧在美演出的事情，有人直接向我提出，因此，对他们的努力，我是知道的。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个要求，我还是不能不表示拒绝，因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就要在美国开展一个新的计划，如果我的名字过多地同其他一些活动联

系在一起，那就有可能引起混乱，这是我们受不了的。”

显然，宋庆龄当时正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某个计划做着筹谋，该计划非常重要以至于宋庆龄不想因为任何别的活动影响它的实施。而四十年代末，宋庆龄花了极大精力促成的事便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代表“中国福利呼吁会”(China Welfare Appeal)的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于1949年4月在美国纽约成立。但组建该会的构想早在1948年初便已形成。

呼吁会的成立与另一个组织“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有着直接联系。美国援华会是抗战初期由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友人组建的，该会将募集的医药物资和资金交给当时的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用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统一管理美国援华救济资金，组成美国联合援华会(United Services to China)，美国援华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机构。1945年底，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美国援华会继续为其提供从美国联合援华会处获得的物资和款项。但是随后，美国联合援华会的行为逐步背离成立时的宗旨，用种种理由削减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拨款，1948年起停止供给，并公开进行反共宣传。作为其成员机构之一的美国援华会便无法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筹措到任何资金。

面对如此窘境，宋庆龄与她的友人们开始“另辟蹊径”。宋庆龄认为美国援华会不再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也不再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所支持的事业，她认为面对美国目前的形势和他们所属机构的内部压力，美国援华会最终将背弃目前还残存的假象。她决定另建一个组织来“取而代之”。当时是1948年3月。宋庆龄写了一封长信给她的美国友人，对整个计划提出详细建议，强调准备工作要隐蔽进行。

数月后，即1948年11月，正如宋庆龄所预见的那样，美国援华会宣布解散。于是，宋庆龄和她的美国友人们组建新机构的计划开始“浮出水面”，并步入正轨。直至1949年4月中国福利呼吁会最终成立，期间宋庆龄一直都在竭力增强这个新机构的影响力，她写信给诸多外国友人，向他们介绍呼吁会成立的原因、职能，请求他们的支持。她致函美国各界人士，包括劳特贝齐(Richard E. Lauterbach)^[3]、哈伯(E. Y. Harburg)^[4]、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史迪威夫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5]、利尔泰德(Catharine D. Lealtd)^[6]、菲茨杰拉德^[7]、华莱士、哈里·布里奇斯^[8]、福尔曼^[9]、埃罗塞博士(K. Leo Eloessez)^[10]，等等……

可见宋庆龄对于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成立是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期待的，组建呼吁会，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重设获得海外救济物资的渠道，可以说是她那

一阶段最为看重的一项工作。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呼吁会的组建过程充满波折，阻碍重重，宋庆龄等人一路披荆斩棘，用了极大的努力去确保呼吁会的最终诞生。

因而，在这个敏感时期，威拉德·科夫人的来信显然有些不是时候。宋庆龄不希望把自己的名字跟呼吁会以外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她担心那样会导致美国人民对她以及将来对呼吁会这个组织存在疑虑，这也就是她在信中回答威拉德·科夫人“使用我的名字和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发出呼吁很可能造成混乱。因为不想以任何形式妨碍我们的朋友在那边所做的巨大努力”的原因。

结论

1946年，宋庆龄赞助音乐剧《孟姜女》在上海上演是为她发起的作家艺术家“文化福利基金”筹款，为了把筹得的款项捐赠给在战争中受到摧残的中国的作家、艺术家，鼓舞他们去恢复和发展国家战后的教育和文化事业。而1949年，宋庆龄拒绝赞助音乐剧《孟姜女》在美国上演，是为了不影响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建立，也就是为了之后更顺利地在美国筹集到各种物资和款项，从而在国内广泛开展救济工作。短短三年间，宋庆龄对《孟姜女》一剧的上演先后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并不是她的反复，而恰恰正体现了她战后工作重心的始终如一，即呼请国内外人士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给中国人民以更多的援助，帮助中国度

过战后的困苦期间。

在国外架设桥梁是宋庆龄开展救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美国纽约的中国福利呼吁会即为此所作的一次努力。在美国援华会无法继续合作的情况下，呼吁会就成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和希望，而美国是争取救济物资的一个重要阵地，可以想象宋庆龄对这个组织倾注了多大的心血和期待。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拒绝赞助《孟姜女》的上演就很容易理解了。



[1]《宋庆龄书信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2]《孟姜女》一剧的英文名为“The Great Wall”，因而也译为《万里长城》。

[3]美国友好人士。

[4]美国友好人士。

[5]德籍现代物理学家。建立相对论，192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27年与宋庆龄、高尔基等人发起成立国际反帝大同盟。1933年后移居美国。

[6]黑人女医生，供职于联合国救济总署，曾向中国解放区运送物资。

[7]美国电气、无线电及机构工人联合会领袖。

[8]美国国际码头及仓库工人工会领袖。

[9]美国人，曾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回美，是美国援华会成员。

[10]美国人，胸外科手术专家。曾到中国，建立各种医疗救济团。

宋庆龄与足球的故事

撰文 / 傅强

2013年3月24日下午，英国球星贝克汉姆来到北京宋庆龄故居参观瞻仰。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宋庆龄生平陈列和故居，向这位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敬献鲜花。参观结束后，贝克汉姆还在故居的草坪上一展球技。这位足球大使可能想象不到，其实，宋庆龄与足球运动也有着一段渊源。



▲ 贝克汉姆参观北京宋庆龄故居

1942年冬至1943年春，久旱后的大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河南省遭受特大水灾，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为赈济河南水灾灾民，宋庆龄决定在重

庆发起组织一次国际足球义赛。宋庆龄的倡议得到了各国大使和重庆市长贺耀祖的支持，很快便组成了四支参赛球队，分别是由沪赴渝的全国足球名流组成的“沪星队”，由重庆当地体育人才组成的“东平队”，由英国驻华使馆、军舰等工作人员组成的“英联队”和当时韩国在华青年组成的“韩青队”。比赛门票分为荣誉券和普通券两种，荣誉券又分100元、200元两种，由宋庆龄亲自推销，普通券一律10元，由社会服务处代销。

5月15日，国际足球义赛在川东师范学校广场（现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开幕。宋庆龄在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陪同下，缓步行至球场中，6000余观众全体起立致敬。宋庆龄与参赛4支球队的队员们一一握手，以示感谢，并亲自主持开球仪式。虽然此次赛事赛场的布置十分简朴，观众席就是用长木板铺在架子上制成，只有少数贵宾坐折叠

椅，而且上面也没有遮阳。但是，观众们热情高涨，不仅门票抢购一空，比赛用球以500元拍卖给一位爱国人士，连比赛的全部费用也由某巨商“自愿担负”。最后，沪星队五比二战胜韩青队，而东平队则以六对三完胜英联队。在闭幕式上，宋庆龄将四面锦旗分赠给四支参赛球队，还赠给每位球员一枚刻有“参加筹赈豫灾足球义赛纪念 孙宋庆龄赠”字样的纪念章。此次国际足球义赛共募得125530元，后全部汇交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专门用作赈济豫省灾民。

宋庆龄组织的这次国际足球义赛不仅为灾民们雪中送炭，也让战争年代沉寂甚久的足球空气为之一振旗鼓。



▲ 宋庆龄在足球义赛的开幕式上

说到宋庆龄与足球的故事，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被称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李惠堂，字光梁，号鲁卫，广东五华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足坛的第一人。他球艺精湛，一生获得无数荣誉，当时民间甚至流传着“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佳话。

退役后李惠堂还曾先后担任香港足总执行委员、亚洲足协副会长、国际足球联合会副主席，当年在足坛的影响力，并不亚于今日的“小贝”。李惠堂不仅球艺精湛，更有着一颗爱国之心。抗战时期，汪伪政府曾对他威逼利诱，李惠堂断然拒绝，辗转回到了故乡。后来，为了响应宋庆龄救济水灾难民、慰问抗日将士的号召，李惠堂组织起足球队，先后在桂林、柳州、南宁、重庆、成都、南充、自贡等地举行足球义赛和宣传活动138场，以自己的方式筹集善款赈济灾民，支持抗日救国。

李惠堂的义举让宋庆龄非常欣赏，1946年夏，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募集中国灾荒救济基金，宋庆龄亲自邀请李惠堂带队来沪举行足球义赛，筹集善款。李惠堂欣然应邀，出面召集香港足球名将组成球队，并于7月抵达上海。在欢迎会上，李惠堂激动地表示：“此次承孙夫人之邀，来沪举行义赛，得与旧雨新知晤聚一堂，曷胜欣幸。”不料，国民党当局认定中国福利基金会此举是为了援助解放区，极力阻挠破坏。宋庆龄闻讯十分气愤，她亲自会见李惠堂，明确表态：“你们是我请来的，不让我给你们比赛，那么送你们回去，是我的责任。”虽然申城各界纷纷抗议国民党“政治干预体育”的行为，但在当局的一再干涉下，义赛最终还是夭折了。李惠堂带着球队返回了香港，而基金会则蒙受了巨大损失，因为此次不仅不能靠足球

队筹款，还得支付把球队请到上海来的巨额费用。

尽管如此，李惠堂对救济福利事业的热情还是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宋庆龄再次与李惠堂商议，由香港足球协会出面举行义赛，为中国灾荒救济基金募捐。宋庆龄告诉何香凝，她觉得，直接与李惠堂打交道比请香港的朋友协助“效果要更好一些”。同时，她还致信香港《星岛日报》负责人胡好，希望星岛足球队在上海为中国灾荒救济委员会踢一场义赛，以弥补去年的损失。这次，宋庆龄吸取了去年的教训，一方面向上海体育联合会申请许可证，另一方面还提醒对方办理“任何需办的政府方面的许可证”。宋庆龄还特别说明：“当然，这次我们不能支付星岛球队的旅费及他们在此期间的任何费用。”毕竟，中国福利基金会资金有限，而在战争的阴影下，有太多需要援助的民众，所有的资金都必须用在“刀刃”上，任何的浪费都会让宋庆龄心痛不已。

此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与李惠堂以及香港足协之间的合作成为了一种惯例。1948年2月，宋庆龄致信香港足协秘书，对去年收到的捐款表示感谢，而今年，“这种帮助更加需要”。1949年，宋庆龄又直接致信李惠堂，谓：“去年你与陈汉明先生为上海儿童工作取得基金给予帮助，万分感谢。据陈先生告知，本季度末可望又一次收到香港足球协会分配的基金。”“随信附上给

足协秘书的信，概述敝会1948年期间开展工作的情况，但鄙会仍处困难之境，尤其是上海穷苦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年如能大力帮助使敝会得香港足协基金的再次分配，我们将不胜感激。”

宋庆龄去世后，为了纪念她，1982年5月29日，在北京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邓小平同志亲自担任基金会名誉主席。从那时起，宋庆龄基金会就一直积极支持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先后在新疆、延边等地开设了宋庆龄足球学校，培养出了不少优秀足球运动员，活跃在中超、中甲和中乙的赛场上。2011年，宋庆龄基金会又专门设立了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新疆和延边宋庆龄足球学校的发展、举办全国性青少年足球比赛、开展两岸及港澳青少年足球赛等，此外，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还将与中国足协共同举办两岸暨港澳青少年联赛、全国U15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等。如今，宋庆龄与足球的故事正被她的后继者们用另一种方式续写着。



▲ 1964年5月，宋庆龄观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小足球队》后，与演员们合影。

微博营销经典案例的启示

撰文 / 许毅捷

2006年Twitter现身美国，取代了Facebook等社交网站，成为最主流的信息传播方式后，国内的各家网络机构纷纷探索尝试，直到2009年新浪微博的诞生，迅速在网上聚拢了庞大的人气，在3年多的时间里，其注册用户一直保持着爆炸式的增长，数据显示2012年新浪微博的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3亿人，如此庞大数字已让任何机构个人无法忽视其产生的社会效益。

我馆也在这一媒体革命的大潮当中，开通了官方微博。开通微博是朝夕之事，而如何运营好这一新的媒体平台，却是需要时间的积淀。笔者翻看了一些微博营销的案例后，得到了些许的启示，希望对维护好我馆的微博起到一定的作用。

案例一：微博快跑——以线下活动造线上事件

2010年8月28日，新浪微博一周年。这一天，一场“微博快跑”活动绕城举行：十辆造型各异的MINI微博车队，载着特色礼物和8名网上征集的微博用户，从中关村出发，穿越北京的大街小巷，途经五道口、鸟巢、朝阳公园、天坛、西

单、南锣鼓巷等北京地标性场所，将微博“随时随地分享”的精神传递给每一个路人。活动当天，车队每到一站都会组织车内、现场和线上的网友进行互动，共产生30000多条微博内容，引发各大媒体高度关注和报道。

这一活动应该算是所有微博线上线下联动的始祖了，这也就是该案例的经典之处。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非常深刻，微博的每个用户都是信息的发布传递员，而这些信息将在用户之间构建起来的关系网上以几何级的速度传播出去。我馆的微博刚刚开通，可以说仍处在试运行的阶段，在此时期，不妨开展几次线上线下联动的“微活动”以此来累计人气，同时，也等于以最直接的形式告知我馆开通微博的消息，增加粉丝数，从而为之后信息传播的广度奠定传播网基础。

案例二：东方航空——朋友式交流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微博@东航凌燕目前拥有将近9000名粉丝。东航凌燕召集了大概最能代表航空公司形象的空姐们，每位空姐都姓名确凿，前

面加上凌燕二字。微博的主要内容多是空姐们在世界各地拍摄的风景照片，或者平时旅客们看不到的飞机驾驶舱等等。整体风格朴实有亲和力，符合大多数人对于航空服务业的印象。

微博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及时和真实性，“织围脖”的是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人，而非一个机器。微博相较传统媒体而言，其信息带有信息发布者的主观意识，而这一特性与传统媒体报道要求“保持客观”背道而驰，但这一特性却迅速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更具亲和力。所以，越来越多的机构、企业选择用朋友交谈般的言论来发布信息，似乎这也成了微博世界中的一项公认的准则。

我馆长久以来力求塑造优雅、亲和、“家”的公众形象，再结合微博这一公众平台的特性，无疑“官方微博”将成为我馆进一步打造公众形象的有利契机。如此一来，在微博上的每一条动态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公众形象的传递，那么字里行间的表述在准确之余，更需要一份朋友般的亲和力，太官方的言辞在微博的世界里，显得生硬而有距离感。微博领域中的“朋友式交流”不仅是这一媒介的特质，更是契合了我馆的公众形象。“官方微博”这个词不如分开来理解，“官方”指的是信息的严谨与准确性，而“微博”则是具有个性、充满亲和力、轻松活泼的代名词，如此刚柔并济的存在又恰恰符合了“宋庆龄”的

形象，可以成为微博运营中的一条明道。

案例三：诺基亚 N8 微博发布会——享受便捷高效，接收鱼龙混杂

诺基亚联合新浪微博、人人网、开心网和优酷网的全社交网络为首款搭载 Symbian3 系统的手机——诺基亚 N8 召开网络发布会。直播会当天，新浪微博首页推出诺基亚 N8 手机“微博发布会”，7 小时内即收到微博评论、转发 89034 条，诺基亚新浪微博首页关心人数到达 49277，被业内称作品牌营销的又一成功案例。然而，微博营销是个双刃剑。诺基亚 N8 微博直播门在网上疯传，原来是新浪微博直播伊始，页面出现短暂停顿，一个小时后，硅谷动力发文称当时播放出了不良视频。某新闻稿件里这样描述：

“一边是中国最权威的新闻门户的视频直播，一边是全球最顶尖的手机商重量级发布会，在这样重要的发布会中竟然被插入色情内容。”瞬间引爆了整个网络，人们在微博上、论坛里、甚至 MSN 好友间互相求证着。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网络、手机的两大巨头联手合作，且不论是不是其中一方的炒作，但这一事件的影响力足以挑动网络黑客的神经。

虽说我馆微博的号召力与那些商业巨头和权威机构不可比拟，但这个案例把“双刃剑”这一点诠释地淋漓尽致，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与其说这个案例提供了我们新媒体使用的形式，倒不如

（下转 36 页）

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和谐发展

——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2011 至 2012 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撰文 / 夏义坤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本着对观众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宗旨，加强诚信建设，履行社会责任。两年来，纪念馆挖掘馆藏资源，举办各类展览，扩大免费开放范围，提高观众满意度，开展志愿者服务等，在保护历史遗产，扩大宣传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和进步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各方的认可。

一、诚信服务

诚信是纪念馆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始终坚持公益性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积极推出各类展览和服务项目，提供社会优秀和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观众精神文化需求，很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

1. 坚持公益性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作为文博单位，以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积极服务于观众，服务于社会。长期以来，本馆严格执行上级的指示，不断扩大免费开放范围，免费接待 1.3 米以下儿童、70 岁以上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以及



▲ 5·18 国际博物馆日，故居免费对外开放，门口等候参观的观众排起了长队。

预约的中小学生团体等社会群体。每逢宋庆龄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日、“5·18 国际博物馆日”、“5·19 中国旅游日”，纪念馆都推出“以鲜花代门票”等免费或优惠开放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纪念馆，了解历史，学习知识，陶冶情操，感受伟人的崇高精神和风采，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2012 年，纪念馆又根据上级要求，对大学生团体实行免费、60 至 70 岁老人实行门票半价优惠，使得纪念馆的优惠范围进一步扩大。两年来，其中免费接待观众 4 万余人，占年接待总数的 28%，优惠接待观众 6 万余人，占总人数 37% 左右，赴外地举办展览，免费

接待观众 118 万余人，较好地履行了纪念馆在公益性和文化服务方面的职能和作用。

2. 举办专题展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纪念馆积极挖掘馆藏文物资源，加强文物的考证和研究，配合重大活动和重要工作的开展，举办独特、精美的专题展览，形成本馆产品特色，满足观众精神文化需要。两年来，纪念馆先后结合纪念建党 90 周年，举办《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文物图片展；结合宋庆龄逝世 30 周年，举办《遗爱长留——隋永清藏宋庆龄文物展》；结合宋庆龄逝世



▲《遗爱长流——隋永清藏宋庆龄文物展》局部

31 周年，举办《宋庆龄藏木刻版画展》；此外，为了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纪念馆还积极参与在日本长崎举办的《孙中山·梅屋庄吉与长崎》展、赴台举办《国之瑰宝——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书画展》等，这些展览展品独特、形式

新颖、内涵丰富，从不同侧面向广大观众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宋庆龄生平事迹，弘扬了宋庆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品德，受到了境内外广大观众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3. 提高满意度

观众是纪念馆的服务对象，观众的满意度是衡量纪念馆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始终坚持“观众至上，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千方百计为观众提供热情周到、安全舒适、优质满意的服务。两年来，纪念馆参与了徐汇区旅游标准化创建和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把提高观众满意度作为馆创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加强旅游环境整治，打造品牌展览，完善服务设施；另一方面，在故居内完善了讲解员公示牌、观众意见箱、留言簿和观众满意度调查表等，做到及时了解观众、熟悉观众，修订服务规范，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水平，贴近观众需求，始终保持观众满意率在 99.8% 以上。同时做到内部管理井井有条，工作流程规范有序，环境面貌整洁美观，设施设备运行良好。一线接待讲解人员仪表端庄、精神饱满、服务热情，通过一个舒心的微笑，一句温馨的问候，一个及时的引导，让参观者有宾至如归之感，体验文化旅游的快乐。两年来，纪念馆无一起因诚信和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的纠纷，真正做到了零投诉。

二、志愿服务

志愿者服务对于传递爱心，传播文明，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积极发动党、团员参加本市各公共场所志愿者服务活动，激励和引导员工学习雷锋精神，奉献爱心，乐于助人，积极参加志愿服务，为城市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两年来，馆先后开展了“承载希望、妆点梦想”为主题的一系列学雷锋活动；组织徐汇中学学生会的学生代表剪图案，折鲜花和纸鹤，写寄语，与募捐文具图书一起，交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送至贫困山区的希望小学；安排员工参加在公安博物馆举办的“雷锋就在我身边——场馆嘉年华”活动；为社区居民、学生和残疾人提供免费咨询、科普教育等服务；举办“樟叶寄思念 伟人在心间”活动，动员“宋庆龄班”同学义务清扫故居庭院落叶，寄托对宋奶奶的思念，表达对伟人的敬意等。纪念馆全体党、团员甘当一名社会志愿者，集体在上海市志愿者网上登记注册，参加社会公益性志愿服务。两年来，馆定期安排员工参加社区开展的交通文明岗执勤活动，参与执勤人数80余人次；常年安排一名员工每周二下午为共建单位康平居委的离退休老同志义务辅导英语；与本市14所中学共建“宋庆龄班”，安排讲解员

担任“宋庆龄班”的志愿辅导员，配合学校和部队等单位开展爱国主义宣传演讲活动；向学校和社区推出了“菜单式”不同专题巡展和不同专题宣讲项目服务等。同时，纪念馆还努力建设志愿者服务平台，修订完善志愿者招聘、培训、考核、上岗制度，编撰志愿者培训教材和培训资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志愿者服务工作规范，较好地发挥了“市志愿者服务基地”的作用。

三、社会评价

两年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在上级主管和业务部门的直接指导下，紧紧围绕纪念馆的建设和对外服务工作，群策群力、开拓进取，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很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促进了社会和谐和文明，受到了上级的表彰。2011年4月，荣获2009-2010年度（第十五届）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2012年2月，荣获“2010-2011年度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单位”称号；2012年8月，被全国质量评定委员会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2年12月，被上海市旅游局评为上海市旅游系统“先进集体”；2013年5月，再次荣获2011-2012年度（第十六届）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

“宋庆龄 1963 年后迁居 (长住) 北京”说质疑

撰文 / 胡炎

在介绍上海宋庆龄故居时候，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宋庆龄 1949 年春迁居这里，1963 年以后因为工作关系她迁居北京（或长住北京）逢年过节回上海……”。2005 年 7 月出版的《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一书中也这样描述：

“1963 年 4 月起，宋庆龄因工作、年龄等原因不便再南北奔波，遂以北京后海北沿 46 号为主要居住地。但宋庆龄对上海的住所依然非常眷恋，只要条件允许或者逢年过节，她必定会回来住一段时间。”^[1]

事实上，1963 年宋庆龄迁居北京与史实不符，1963 年以后长住北京也缺乏依据。

首先，宋庆龄从没有迁居北京的主观愿望。

宋庆龄始终把上海淮海中路 1843 号当作她的家，从 1949 年到 1981 年，32 年的时间没有任何改变，更没有迁居的打算。1949 年宋庆龄应中共之邀北上参

加政协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当时中央已经在北京给她专门安排了在京很少有的西式住宅，即方巾巷 44 号。宋庆龄本人也很满意，但是她并没有就此定居北京，而是选择回上海，只是在每年工作需要的时候再去北京，从而形成在上海、北京两地生活的状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所以她去北京生活是为工作去的，并没有迁居的意思。然而身居高位的宋庆龄常常会因为工作而身不由己，从而造成有些年份在北京时间长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此迁居北京。有一年她非常想回家，但因为种种原因，中央让她暂留北京，她很无奈，在给友人的信中她竟从节能的角度为自己回上海找理由，她说，“北京偌大的房子一天取暖用掉的煤在上海可用一个月，从我在给工厂节煤这一事实足以让我有理由在南方过冬。”^[2]“我自己等这里的事情一了就要回到可爱的上海家中去休

息一阵。”^[3] 当她回到上海后，又总是对这里很留恋，她给友人写信说“我准备在这里再呆两个月，就回到我的‘岗位’上去。这里的天气比北京温和得多，虽然多雨，我还是喜欢这里，不喜欢北方那干得要命的气候。”^[4] “春天来了，我的花园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真希望欣赏一番。好景不常，很快我就要离开我这个可爱的家了。”^[5] 从中足以看出她对上海的眷恋。相比之下对北京的住所，宋庆龄明确地表示“我从来不喜欢大房子，没有家的感觉。”^[6] “可惜这是政府的房子，我们不能随心所欲。”^[7] 所以从宋庆龄的主观愿望看，她并不愿意定居北京，所以不应有迁居北京一说。

第二. 从解放后宋庆龄在上海、北京的居住情况来看

解放后，宋庆龄在上海只住在淮海中路 1843 号。在北京却因为各种原因，中央为她先后安排了三处住所。分别是方巾巷 44 号、北海西河沿 8 号和后海北河沿 46 号。

1949 年 8 月宋庆龄北上时，中共中央就在北京专门给她安排了住宅。那么能不能认为，1949 年宋庆龄就迁居北京了呢？恐怕没有人会这么想。后来宋庆龄在北京的住处因为各种原因又搬迁过几次，先是 1959 年从方巾巷搬到北海西河沿，1963 年又从北海西河沿搬到后海北河沿。很容易看出，1963 年的搬迁和 1959 年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宋庆龄在北京的住所迁移，并不是从上海搬家迁



▲ 上海宋庆龄故居主楼外景

居北京。所以说宋庆龄 1963 年从上海迁居北京是不成立的。还有一点补充，就是解放后宋庆龄参加的选举活动是在上海登记的。

有人还会以 1963 年后宋庆龄长住北京作为事实依据。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1963 年后宋庆龄在上海、北京两地的生活情况是不是和之前有明显的变化。

第三. 从宋庆龄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来看

有人认为 1963 年 4 月以后宋庆龄就长住北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宋庆龄从 1949 年开始就经常在北京居住了，1959 年因为北京市政建设等原因，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的住所搬到了北海西河沿。1963 年因为北海西河沿的房子潮湿等原因，中央又给宋庆龄安排了后海北河沿原清朝醇亲王府内。4 月 1 日，周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从上海来的宋庆龄，并送她到新居。之后宋庆龄在北京的住所就再也没有搬过，一直到她去世。那么是不是 1963 年后宋庆龄就和往年不同，长期居住在北京了呢？下面列出的是宋庆龄从 1959 年到 1970 期间在上海

寓所生活的时间表。

年份	居住月份
1959年	1月1日—4月10日、10月下旬—12月31日
1960年	1月1日—3月20日、8月20日—12月31日
1961年	1月1日—5月28日
1962年	1月11日—3月7日、7月10日—12月31日
1963年	1月1日—4月1日
1964年	3月8日—9月1日
1965年	1月15日—9月1日
1969年	10月16日—12月31日
1970年	1月1日—9月5日

从这张表中可以看出，1963年之后的2年里，宋庆龄还是和往年一样来往于京、沪两地。没有发生和以前完全不同的质的变化，或者说是在北京居住更长时间。1964年从3月8日到9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生活了5个多月将近半年。在这里她会见了董必武、周恩来、锡兰自由党同盟代表团等。1965年从1月15日到9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生活时间更是长达9个月。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在家里和工作人员一起过年，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印尼国会议长，接待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国建设的外国专家、招待中福会工作人员，庆祝中福会成立27周年等等。

1963年之后的两年，宋庆龄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并不比之前的几年长很多。只是到了1966年后的三年里，她的确没

有回上海。那是因为当时处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中央为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让她暂时不要回上海，留在北京的保护之举。那时宋庆龄的出身和人民公敌的亲戚都会成为冲击的对象。好在毛泽东让周恩来拟了一份保护名单。据说，保护名单第一个就是宋庆龄，中央警卫局还专门为宋庆龄在北京的住所增派警卫保护。1969年形势稍为稳定后，宋庆龄就提出要回家。中央同意她回上海，但希望她国庆节回京，于是她坚持到10月16日国庆活动结束后才回到上海。在上海一住就是一年，到70年9月才赴京。文革后期宋庆龄也有3年没有回过上海，但她心里是非常想家的，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使她回家的行程只能一再延后。

所以从以上几点来看，1963年后宋庆龄迁居北京，或是1963年后宋庆龄长住北京，都是与史实不相符的。



[1]《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文物图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7页。

[2][6]宋庆龄致邓广殷信，1972年11月3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3][4][5]《宋庆龄书信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2页，第698页，第807页。

[7]宋庆龄致邓广殷信，1974年7月2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解读“三公里文化服务圈”

撰文 / 傅强

近期，为进一步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请进来”、“走出去”和“线上线下”文化服务常态化，上海市委宣传部率先启动“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建设。5月21日，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龙华烈士陵园、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等首批20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复旦大学共同签定《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公约》。那么什么是“三公里文化服务圈”？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何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本文将结合本馆的工作进行一些粗浅的解读。

什么是“三公里文化服务圈”？

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提出与中央提出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对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非常明确具体的要求，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委宣传部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多年来

的工作和现状，提出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作为本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而《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公约》则是将“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工作落到实处，根据《公约》规定，今后将以每个教育基地为中心，以“三公里”为半径，划定核心服务圈，把周边学校、社区、企事业、机关、部队、村镇及社会组织等固定为服务对象，每年输出专题展览、讲座宣讲、主题活动等文化服务不少于12次。

具体来说，“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范围和对象是指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中心，以“三公里”为半径，划定服务核心圈，覆盖步行约半小时、出租车起步范围、公交车约四站路的距离，圈内学校、社区、企事业、机关、部队、村镇及社会组织等为基本服务对象。

“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主要服务内容是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挖掘盘活资源存量，开发推出文化系列服务，在既有“巡展、巡讲、巡演、巡播”等服务项目的基础上，面向服务对象提供菜单式服务、预约服务、定向服务，每

年有针对性地举办专题展览、讲座宣讲、实践课程示范、主题活动等各类文化服务，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设计讲解内容、改进陈展方式，开发活动项目。同时，吸引圈内服务单位的优秀文化产品“走进”教育基地。继续做好未成年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实行减免或优惠参观。

“三公里文化服务圈”还包括积极运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爱国主义传播服务载体，建设教育基地网上虚拟展厅，创办官方网站、微博等形式的新媒体互动平台，开展微展览、微故事、微留言、微视频等“微系列”宣传展示交流。鼓励宣教、社教部门工作人员更好运用微博、微信等开展网上讲解和传播，形成“线上线下”有效互动。加强与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协调合作，利用地铁、商业中心、公园等人流集中地区，加强宣传展示，开展主题活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服务的表现力、亲和力 and 影响力。

“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圆圈，《公约》特别指出，教育基地还应根据自身的历史沿革、区域分布、归口管理、场馆规模等特点，加强馆际合作、馆区合作，按照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操作原则，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体制相联、地域相邻、主题相近的教育基地联手共建区域性文化服务圈，与全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主题巡访线结网连片，推动教育基地、文化服务圈之间资源的合理流动、集成利用。与《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公约》相配套，上海市委宣传部还在近期对《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综合评估指标》进行了修订，将《公约》的要求进一步细化为评估指标，并明确：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将是对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评估考核的重要内容。

如何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

那么，对我馆来说，应该如何顺应形势，如何积极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1. 制度层面

在《公约》中，明确要求教育基地加强对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建设的组织协调，列入各教育基地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开展专题研究，配置工作力量，安排专项经费，制定制度措施，加强运行管理，督促工作落实，确保稳步推进。

因此，作为我馆来说，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首先应制定相关制度。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绝不是某一个部门的工作，要履行《公约》，面向全社会提供各项文化服务，需要集全馆之力。本馆应以制度的形式明确：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是我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目标是什么；这项工作包括哪些内容，

涉及到哪些部门，如何分工；这项工作由谁负责、由谁落实、由谁检查考核等等。

同时，为了确保工作推进，应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制定工作计划，配置工作力量，从人员和经费两个层面保障工作的开展。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还包括对现有工作方式和内容的调整，举例来说，目前我馆“三公里服务圈”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共建单位，那么，除了已签订的“共建协议”外，是否有必要与共建单位进一步沟通，深入了解对方的需求？目前我馆每年召开共建单位座谈会，会议的主要形式是以介绍我馆一年来共建工作开展的情况以及下一年度共建工作计划为主，共建单位代表更多时候是在“听”。现在，当共建单位成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否应进行相应的角色转换，让共建单位去“说”，而我馆则倾听对方的诉求。

最后，还应参照《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综合评估指标》，建立相应的检查考核机制。有人认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作为我馆主动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举措，必然会受到服务对象的欢迎，没有必要进行检查考核，其实不然。任何一项工作，为确保工作质量和工作绩效，都应建立相应的检查考核机制。就构建“三公里服务圈”来说，首先应检查我馆是否按《公约》要求，向服务对象提供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即在数量上是否达标；其次应以满意度调查、问卷访谈等形式向服务对象了解我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

务是否满足了对象的需求，有无值得改进的地方，即在质量上是否达标。

2. 操作层面

从操作层面，参照《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综合评估指标》，我馆可以从参观服务、文明共建、巡回展览、讲座宣讲、课外实践、主题活动、场地服务、合作联动和新媒体的开发利用等方面来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

①参观服务

参观服务是我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手段，“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强调的是辐射周边，但是并不意味着放弃场馆的基本服务，事实上，“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出发点恰恰是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有效利用，扩大宣传展示、开放服务覆盖范围，在做好“请进来”工作的基础上“走出去”，所以，日常参观服务，包括讲解接待、游客咨询仍是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工作内容。

②文明共建

《评估指标》中明确指出，教育基地除了签订“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公约，还应与“服务圈”内学校、社区、部队、企事业单位签订协议，共建共享文化资源，服务对象不少于10家，并争取逐年递增。对我馆来说，目前有20家共建单位，从数量上来说是“达标”的，但是，当时签订的“精神文明共建协议”中没有“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内容，所以有必要对共建协议进行相应修订，补充相应内容，并争取逐步扩大共建范围。

③巡回展览

巡回展览是最常见的文化服务形式之一，我馆目前有成熟的主题展览四个：

《宋庆龄在上海》、《国之瑰宝——宋庆龄》、《唯菊与石，品质高洁——宋庆龄的高尚品格》、《琼英留韵——宋庆龄与妇女解放》，这几个展览此前都曾在不同范围进行过巡展，收效良好，所以，巡回展览应是我馆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主要形式。

④讲座宣讲

讲座宣讲是另一种常见的文化服务形式，我馆目前有针对不同受众的主题宣讲六个：《宋奶奶的故事》（针对小学生）、《宋庆龄的高尚品格》（针对中学生）、《宋庆龄与上海》（针对大学生）、《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员）、《宋庆龄与统一战线》（针对港澳同胞、民主党派）、《宋庆龄与抗日战争》（针对部队）。多年来，这几个宣讲经过主题不断提炼，已经趋于成熟。此外，近年来我馆学术研究成果丰硕，条件成熟时，应请相关人员以“故居讲坛”的形式开展学术讲座，将研究成果向公众普及。所以，讲座宣讲应是我馆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另一个主要形式。

⑤课外实践

目前与我馆有共建关系的20家单位中有大半是命名“宋庆龄班”的中学，多年来，我馆开展的“宋庆龄班”主题教育活动经过不断提升、丰富，已初步形成品牌效应。同时，这些“宋庆龄”

班所在学校大多处于“三公里文化服务圈”范围内，所以，创建“宋庆龄”班，为“宋庆龄”班同学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课外实践活动应成为我馆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特色内容。

⑥主题活动

大型主题活动也是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一项内容，近几年，我馆结合各种主题和纪念日，先后举办了“建馆30周年纪念活动暨志愿者服务基地揭牌仪式”、“邓广殷藏宋庆龄书信捐赠仪式暨隋永清藏宋庆龄文物展开幕仪式”、“《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宋庆龄与上海》首发式暨《同志·朋友·亲人——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一家的情谊》文物图片展开幕仪式”等大型主题活动，将来，这些主题活动也应被视为我馆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工作的一部分，同时在活动中，应多邀请周边普通民众和服务对象参与，进一步体现公益性质。

⑦场地服务

虽然我馆硬件条件十分有限，但是长期以来，我馆一直坚持无偿为共建单位、学校、各类社会团体提供场地服务，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则对我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标体系》要求教育基地不仅免费为服务对象提供场地服务，还应与“服务圈”内的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建立良好的共建共享机制，以展览、讲座、主题活动等形式，将对方优秀的

文化产品“请进”教育基地。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文化产品“送出去”，还应将服务对象的优秀文化产品“请进来”，要进一步发挥我馆的“平台”作用，让我馆成为不仅成为人们缅怀历史伟人的纪念地，也要成为展示当代优秀文化产品的舞台。

⑧合作联动

《指标体系》要求教育基地之间开展合作联动，合作推出服务项目。从地域角度来看，我馆与钱学森图书馆、巴金故居、上海图书馆毗邻，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从陈列主题角度来看，我馆又与宋庆龄陵园、孙中山故居有着密切关联，所以，以上单位应是我馆开展“合作联动”的主要对象。地域毗邻的场馆，必然在“三公里文化服务圈”覆盖范围上彼此重叠，因此，适合将各自的服务项目进行整合，配合联合宣传，以“打包”的方式共同为圈内服务对象提供服务。题材相近的场馆，则适合深入合作，整合展览、宣讲等各类资源，共同推出服务项目，如2012年，我馆曾与孙中山纪念馆应邀一同到某单位进行宣讲，分别讲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革命事迹，宣传效果良好，此类方式值得推广。

⑨开发利用新媒体

博物馆、纪念馆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新媒体扩大宣传范围，提升宣传效果，这是近一段时间的热点话题。就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而言，开发利用新媒体主要是指利用网络平台和新媒

体平台创新宣教活动的形式，开办官方网站、开通微博，开展微展览、微故事、微留言、微视频等“微系列”宣传展示交流。目前我馆官方网站和微博平台均已开通，下一步要做的应是扩大受众面和影响力，首先与“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的服务对象互相关注（互粉），在积累了一定人气和影响力后，再有针对性地策划实施“微系列”宣传展示活动。

⑩课题调研

“三公里文化服务圈”是全新的举措，也是上级有关部门对我馆的提出的新要求，虽然教育基地签署《公约》意味着此项工作已正式开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我馆来说，对这项全新的工作还会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即便是上文提出的种种想法，也仅仅是笔者结合以往工作的一些思考。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是否做好上述工作就足够？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还包括哪些方面？从上述几个方面构建“三公里文化服务圈”究竟效果如何？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去进一步思考、摸索。因此，有必要就开展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建设进行专门的课题研究，深入开展需求调研，及时发现热点难点问题，积极探索文化服务圈运行的特点和规律，总结推广有价值的经验做法，开展服务圈运行研讨和业务培训，从而不断创新服务圈的文化样式，实现文化服务题材、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最大限度地发挥我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优雅·时尚 ——馆藏宋庆龄服饰展漫谈

撰文 / 麦灵芝



▲ 优雅·时尚——馆藏宋庆龄服饰展内景

2013年1月宋庆龄诞辰120周年之际，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举办了“馆藏宋庆龄服饰展”。展览以反映宋庆龄热爱生活，时尚优雅为主题，展出了30多件宋庆龄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穿戴过的服装和饰品。其中有她年青时穿过的、最能体现她着装风格的各式旗袍，也有她年迈时穿过的宽大便装，时间跨度达50多年，是宋庆龄着装品味和爱好的集中反映。

展览由中装、西服、便衣、饰品四个部分组成。从时间上看，年代最早的一套衣服是黑色缎面的上衣下裙。这套

衣裙全部用手工缝制，衣领、衣襟、袖口和裙子的下摆处都绣有红色的圆形图案。上衣下裙是民国初年最为流行的女子装束。宋庆龄虽然从小接受西式教育，之后又出国留学多年，但是她一生还是以穿中式服装为主。上衣下裙是宋庆龄年青时经常穿着的服装款式。在她与孙中山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日常起居、出席各种活动，基本上都是穿这种款式的衣服，所不同只是面料和图案的区别。从现有的资料看，1925年以后，宋庆龄基本上就很少再穿这种上衣下裙款式的服装了，转而以穿旗袍为主。

旗袍流行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它线条简洁流畅，婉约含蓄，特别符合中国女性的体型。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初，旗袍成为最流行、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女装。资料显示，宋庆龄从1925年开始穿旗袍一直到1949年，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她的服装款式基本上是以旗袍为主。1949年之后，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还可以看到她穿旗袍的身影。旗袍



▲ 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一起生活时常穿上衣下裙

是宋庆龄一生中穿着时间最长的服装款式，最能体现她优雅的仪态和高贵的气质。宋庆龄身着旗袍的身影，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端庄、优雅的经典形象。宋庆龄爱穿旗袍，也赋予了旗袍别样的光华，她把旗袍看作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抗战时期，她曾把旗袍作为礼物送给美国友人，希望她在为中国募捐的时候，穿上它展示中国女性的魅力。据说上海鸿翔时装公司曾为宋庆龄做过旗袍，上世纪三十年代，宋庆龄还为该公司题过辞：“推陈出新，妙手天成；国货精华，经济干城”。

这次服饰展中展出了宋庆龄穿过的7件旗袍，这几件旗袍大多色泽素雅，手

工精制，用料上乘。代表性地反映了宋庆龄在不同时期、用不同面料、在不同季节穿过的旗袍。其中有一件宋庆龄年青时穿过的丝质旗袍，这件旗袍有着明显的早期旗袍的特征，袖口宽大，袍身平直，并镶有较宽的滚边。还有2件是三十年代她穿过的亚麻格子短袖旗袍和灰色厚呢长袖旗袍。这2件旗袍较之早期旗袍有了明显的腰身，但滚边、镶嵌等装饰则大大减少。展览还展出了宋庆龄在四十年代时穿过的2件旗袍，蓝色蕾丝无袖旗袍和黑色提花薄呢短袖旗袍。这2件旗袍不仅选用了外国的面料还加入了西式的剪裁方法，有了胸省，使旗袍有了立体感，更能衬托女性的婀娜身姿。此外还有宋庆龄五十年代穿过的2件旗袍，织锦缎长袖旗袍和香云纱短袖旗袍。香云纱是四、五十年代流行于岭南地区的一种特别的丝绸面料。宋庆龄怕热易出汗，并有顽固的皮肤病。香云纱轻薄的质地和爽滑不沾皮肤的特性，深得宋庆龄的青睐，常常用它来制作夏季的服装。1949年8月宋庆龄应中共之邀参加新一届政协会议，就是穿着香云纱旗袍北上的。在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上，宋庆龄则是以旗袍加西式短外套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时代的更替，中山装、列宁装成了服装主流。旗袍逐渐被视为旧时代的产物，宋庆龄穿旗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更多时候只是作为一种国务活动的礼服。五、六十年代宋庆龄出访印度、



▲ 宋庆龄出访印尼时身穿旗袍的优雅身影
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等国时依然还能看到她身穿旗袍的优雅身影。

宋庆龄一生穿过不少西式服装，但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这次展出的黑呢长大衣、西装套裙、列宁装等都是她中年以后穿过的衣服。其中黑呢长大衣是宋庆龄解放初期视察东北时穿过的。宋庆龄中年身体逐渐发福后，很在意服装的款式要能修饰身形。有一次宋庆龄准备做套衣服，专门写信向朋友咨询，请她找些能够显得体型修长的式样给她参考。“你如果看到好的服装式样，我指的是短上衣和裙子，请给我送来。我要做套衣服。记得我一定要修长的式样。很多年没有时间看到时装书了。听说现在流行的衬衫式样是两边下摆开衩的。是这

样吗？”^[1]这次展览展出的是一套黑色的西装套裙和一件藏青色列宁装。列宁装是宋庆龄在公开场合穿着次数最多的西式服装。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列宁装成为新的服装时尚，列宁装更是当年时尚女装的先锋。宋庆龄也跟随时代的脚步，穿起了最流行的列宁装。五、六十年代宋庆龄出访苏联、视察云南；在上海会见锡兰总理、迎接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在北京出席国庆庆典、参加各种重要会议、会见各国使节等许许多多重要场合，都留下了身着列宁装的身影。那些年，列宁装几乎成了她的工作服，频繁地出现在她所参加的各种重要活动中。但和很多当时穿列宁装的女性不同的是，宋庆龄会时而在列宁装外披条丝巾，让暗沉的制服增添色彩，巧妙地显示女性的柔美。风靡一时的列宁装到了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后，成了修正主义的象征。所以到1966年以后，许多公开场合就再也看不到宋庆龄穿列宁装的打扮了。保存下来的列宁装，便成了见证那个年代社会风云变幻的重要物证。



▲ 宋庆龄出访苏联时身着列宁装出席活动

宋庆龄上了年纪后，宽大舒适的中式便装成为她最常见的装束。这次服饰展展出了数件宋庆龄平日居家穿的服装，有衬衫、毛衣、棉袄、晨衣、平底鞋等等。这些服饰都很普通，其中一套咖啡色的马裤呢套装很是特别，上装是传统的中式偏襟上衣，下装是宽大的阔腿裤，裤腰和裤裆部分用不同的布料作了加宽处理。不难看出，上了年纪后宋庆龄腰腹变大，原来的裤子穿不下了，便加宽了裤腰和裤裆。可见一向精致优雅的宋庆龄，生活中也有非常节俭的一面。这条与众不同的裤子裤腿特别宽大，亦裤亦裙的式样，是宋庆龄自己设计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见了也非常推崇。宋庆



▲ 宋庆龄在生活中穿着宽大舒适的中式便装

龄曾很得意地告诉友人：“她很喜欢我在家里穿的衣服和裤子，想建议我们妇女都这样穿。那种裤子很宽大，人站着时看上去就像裙子，却有裤子的方便和优点”。^[2] 尽管，最终这种式样的裤子并没有被推广，但在那个以革命为时髦、劳动最光荣的年代，女性都改穿裤子了，宋庆龄却把裤子穿出裙子的样子，不能不叹服她在着装方面的独特智慧。

服饰展的最后部分展出了宋庆龄用过的一些饰品。有手表、折扇、丝巾、手套、化妆品、项链、戒指、手袋等等。展出的2把折扇中，有一把是1956年宋庆龄出访印度尼西亚时用过的。还有一块瑞士罗伊斯牌手表。1949年宋庆龄曾戴着这块表北上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时刻。这块普通的瑞士手表，伴随了宋庆龄40多年，直到1976年11月还可以看到宋庆龄戴着它主持全国人大四届三次会议。

宋庆龄没有很贵重的饰品，一生也很少配戴首饰。这次服饰展中，特别展出了一串用金丝镶裹着数十颗黑色珠子的长项链和一枚方形的黑色嵌宝戒指。这是宋庆龄参加孙穗英婚礼时戴过的首饰。1947年孙科女儿孙穗英在上海结婚，作为长辈，婚礼前宋庆龄就为他们张罗了好几天。11月21日结婚当日下午，宋庆龄与家人朋友一起去国际饭店参加结婚茶会，之后再赴教堂举行婚礼。从当时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到，身着深色旗袍佩戴首饰的宋庆龄，显得那么雍容与华



▲ 1947年11月21日，宋庆龄参加孙穗英婚礼时与家人合影。



▲ 宋庆龄在出访锡兰时，用丝巾，作为服装的点缀。

贵。盛装出席孙穗英的婚礼，表达了宋庆龄对孙穗英真挚的爱和深深的祝福。

宋庆龄虽然不太喜欢戴各种珠宝首饰，但对丝巾却情有独钟。宋庆龄与朋友之间时常也会相互赠送丝巾，表达心意。1943年宋庆龄的朋友西尔维娅·伍赠送了一条蓝色乔其纱丝巾，宋庆龄非常喜欢，经常向西尔维娅提起它，“我依然珍藏着你在游览印度期间送给我的蓝色乔其纱围巾——许久以前的事了！”^[3]后来，宋庆龄还专门给西尔维娅寄去一张她围着那条丝巾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这令西尔维娅感到非常吃惊，宋庆龄居然把这条丝巾保存了35年。是宋庆龄对丝巾的偏爱？还是对朋友的牵挂？可能二者皆有吧。中年以后，宋庆龄常把丝巾作为服装的点缀，在旗袍、西装、毛衣外随意披搭，用最简单的方式营造出优雅的女性气息。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宋庆龄最长穿的礼服是旗袍，那么最频繁出现的饰品，毫无疑问就是丝巾了。当年宋庆龄出访印度、缅甸、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锡兰，或是在上海家中接待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的代表、巴基斯坦总理、印度副总统、锡兰总理等许许多多重要场合，都可以看到宋庆龄身披丝巾的优雅形象。飘逸的丝巾，既修饰了她的体形又增添了女性的妩媚。

和很多女性一样，宋庆龄有化妆的习惯，她画眉，涂口红、涂指甲……这些对她而言既是对美的追求，也是对别人的尊重。有时候她也会把化妆品送给朋友，和朋友一起分享其中的快乐。王安娜是宋庆龄的一位德国籍好友，宋庆龄和她时而会互赠化妆品，交流美容心得。“送你几块供‘美容按摩’用的搓澡石，我想搓一搓会使你很舒服的”^[4]这是1950年11月宋庆龄给王安娜的信中所言。有一次王安娜送了一支口红给宋庆龄，她很喜欢，马上写信回赠了一盒妆粉。宋庆龄在信中写道：“你真好，给我的那支口红颜色很适合我。我给你送去一盒科蒂粉，因为它的颜色与你我的脸色相比更适合于你。”^[5]这次服饰

展同时还展出了宋庆龄当年用过的粉扑、粉盒、口红、粉底纸、腮红、指甲刀、染发棒、香水等化妆用品，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宋庆龄在化妆方面的一些爱好。

宋庆龄爱美，会打扮，也关注时尚，但她的服饰却都很普通，她更擅长的是用简单、实用的方式来表达对美的理解，形成自己的着装风格。无论处于何种时尚潮流，她的衣着总能合乎时宜，又独具特色，在简洁中透出华丽与高贵的气息。她的优雅不仅是表现风度举止的一种方法，更是顺应生活多种不同状态的一种智慧。宋庆龄从不主张修道式的清苦生活，她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那个以制服为美，色彩单一的年代里，她曾竭力向人们解释，时尚和服饰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并预言：“有一天我国妇女也会脱下现在的制服，穿上更为女性化的服装”。^[6]

多年来，我们大多着力于研究、宣传宋庆龄在政治、历史方面的伟大贡献，很少论及她作为女性的一些爱好和生活

情趣。这个展览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伟大女性虽然一生致力于社会革命，但也和很多女性一样热爱生活、关注时尚的另一个侧面。服饰展展出的这些服饰，都伴随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审美取向，对20世纪中国女装发展史而言，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1]《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2]《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3]《怀念孙夫人》，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4]《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5]《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6]《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上接19页）

说是教会我们新媒体时代的传媒心态，在我们享受着新媒体带来的便捷高效的互动同时，必须接受它的不可控和鱼龙混杂，以“塞翁失马”的心境去看待那些不确定因素，建立起危机公关的机制，防范和处理各类突发事件。

还是回到开头的那句话，微博开通

是易，而如何运营维护好它是需要时间来琢磨的。若是运用得好，那便是有一片塑造公众形象、零成本媒体宣传的沃土；若是疏于维护，那便只是空洞的存在，馆公众形象也将大打折扣。以上，是笔者在观察了许多微博营销成功案例后挑选的三则比较有代表性的、对实际工作中有所启示的，在此与大家分享。

关于几张馆藏照片的考证

撰文 / 郑培燕

上海宋庆龄故居保留着两张邓广殷先生当年与宋庆龄的合影照片，一张照片中邓先生与陈乙明分别坐在宋庆龄左右用餐，脸上都流露着愉快的神情，另一张照片中宋庆龄笑容可掬地坐在沙发上，一众好友围在她周围，邓先生席地而坐，大家面带微笑。这些年邓先生每次到上海故居来，都会看看这两张照片，陷入对宋庆龄婆婆深深的缅怀之中。

经请教邓先生，笔者逐一弄清了第二张照片中的人物。前排左起：邓勤、邓先生、陈乙明儿媳；后排左起：黄雯夫人容玉枝、陈乙明夫人黄炜贤、马海德、宋庆龄、路易·艾黎、陈乙明、经普椿、廖承志、马海德夫人苏菲、廖梦醒、爱泼斯坦夫人邱茉莉。关于这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由于事隔几十年，邓先生只记得是二十世纪70年代在宋庆龄北京寓所拍摄的，但是确切的时间都已经记不清楚了。

出于研究工作的习惯，笔者对这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拍摄由来产生了浓



▲ 宋庆龄、邓广殷与陈乙明在用餐



▲ 宋庆龄与朋友们在一起

厚的兴趣，并着手进行一系列的考证。

照片中的陈乙明，是宋庆龄的老朋友，与邓先生也熟识。当年宋庆龄在香港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工作期间，邓先生的父亲邓文钊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司库，陈乙明经何香凝介绍与宋庆龄相识。作为香港著名的执业会计师，陈乙明义务

替保盟审核了3年账目，邓文钊经手的保盟账目，经陈乙明审核，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通过与保盟的合作，陈乙明与宋庆龄、廖梦醒及邓先生的父亲邓文钊也结下了终生的友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陈乙明作为特邀嘉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他也是当选的第一届政协委员中唯一的一位港澳人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设计新中国国旗的特别委员会成员之一。每次陈乙明去北京看望宋庆龄，宋庆龄都很开心。邓先生因为父亲的关系，与陈乙明也相熟。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宋庆龄、陈乙明以及邓先生在两张照片中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由此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两张照片是否可能是同一天拍摄的？

邓先生是自1971年开始与宋庆龄有通信和往来的，而陈乙明是1976年去世的，因而，陈乙明与邓先生同时出现在宋庆龄寓所的时间段便缩小至1971年至1976年之间。笔者翻阅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宋庆龄年谱长编》，1971年至1976年间有记载的是1974年7月11日，根据宋庆龄生前警卫秘书杜述周的回忆材料，“宋庆龄在寓所设宴欢迎来自香港的陈乙明夫妇及嫂子、儿媳（丹麦人）和五个孩子，同时宴请邓广殷及女儿、阿夏及三个女儿，出席作陪的有马海德、苏菲夫妇及其子周幼马，路易·艾黎，柯弗兰夫妇及两位女儿，邱茉莉，廖承志、经普椿夫妇，廖梦醒、北京301医院张福星主任等。”

再来看第二张照片中的人物，《宋庆龄年谱长编》中提到的邓勤、邓先生、陈乙明、黄炜贤夫妇，陈乙明儿媳，马海德、苏菲夫妇，宋庆龄、路易·艾黎、廖承志、经普椿夫妇、廖梦醒、爱泼斯坦夫人邱茉莉都有了，而黄雯夫人容玉枝便是黄炜贤的嫂子。那么这张照片是不是1974年7月11日拍摄的呢？

笔者又翻阅了大量那一时期宋庆龄友人的一些传记和回忆录，在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黎利著《艾黎在中国》一书中，笔者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书中的图片说明显示这张照片摄于1969年，显然有误，因为1969年邓先生还没有开始与宋庆龄的往来。这张照片显然与第二张照片是在同一个场所拍摄的，人物背后的窗帘、盆景以及两个



▲ 《艾黎在中国》一书中的照片

电扇完全一样，且人物坐次也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人物增加了许多，最前排地上坐着5个混血孩子，应该便是陈乙明的5个孙辈，后排左起依次是宋庆龄抚养照顾的两个姑娘隋永洁、隋永清，中间穿条纹上衣的是非洲朋友阿霞，另外

三个黑人女孩是阿霞的三个女儿，阿霞右手边的女孩以及坐在宋庆龄沙发椅扶手上的女孩是柯弗兰、柯如思夫妇的两个女儿凯蒂和玲玲，柯弗兰夫妇坐在苏菲的旁边，而柯弗兰左手边应该便是北京 301 医院张福星主任了。这些照片中的人物与《宋庆龄年谱长编》中记载的 1974 年 7 月 11 日在宋庆龄北京寓所的人物完全吻合，唯一缺的是马海德的儿子幼马。幼马是《中国建设》杂志的摄影师，自 1971 年起宋庆龄的许多私人聚会的照片都是幼马拍摄的，因而此时的幼马可能便在承担着摄影师的职责。由此基本可以确定第二张照片拍摄于 1974 年 7 月 11 日。

与此同时，笔者在陈乙明之孙 Oliver Tan 先生的网络博客中找到了下面这张照片。右起依次是柯如思、邓先生、陈乙明、经普椿、路易·艾黎、陈乙明的孙辈以及阿霞的女儿，照片中人物的服饰都没有变化，唯一不同的就是陈乙明脱掉了西装外套。由此可见，宋庆龄、邓广殷与陈乙明在用餐的照片与 Oliver Tan 先生博客中的照片是同一个场景不



▲ 陈乙明之孙 Oliver Tan 博客中的照片

同角度拍摄的，因此也是拍摄于 1974 年 7 月 11 日。

由此，笔者又想到了馆藏的另外一张照片。

在李湄著的《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中，这张照片的说明写的是“1977 年于北京”。但笔者通过对前面几张照片的对比和分析，认为这张照片也是 1974 年 7 月 11 日拍摄的，其原因有二：



▲ 宋庆龄与廖承志、廖梦醒、邓广殷等人合影

一是看照片中人物的服饰，隋永洁、宋庆龄、邓先生、邓勤、廖梦醒、经普椿的着装与第二张照片及 Oliver Tan 先生博客中照片的着装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廖承志脱掉了外套；二是照片放大看，能辨认出黄雯夫人容玉枝的脸以及陈乙明的背影。结合上述两点，笔者认为这张照片也是 1974 年 7 月 11 日在宋庆龄北京寓所拍摄的。

关于这几张照片的由来，笔者从宋庆龄的部分书信里也找到了答案。宋庆龄原定于 1974 年 7 月 5 日在北京寓所宴请来访的陈乙明及其家人。差不多同时期，邓先生也计划带着女儿去北京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在 1974 年 4 月 9 日致邓

先生的信中说：“希望不久能见到你、君莲、乙明叔叔还有他的孙辈们，一起来或单独来都可以。……我期盼着你和乙明叔叔来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良好，在我家里来个大团圆，让所有孙辈们在花园里露营。我还会叫上马海德的儿子幼马，他是个很好的摄影师，为《中国建设》杂志工作。”在1974年4月17日致邓先生的信中，宋庆龄写道：“你和勤勤、乙明叔叔还有他的“大家庭”要一起来，这真是个好消息啊。顺便说一句，我已经预订了7月7日你们跟我们一起吃晚饭。艾黎、马海德、他的妻子还有儿子幼马，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将把我们团聚的历史事件用照片记录下来。除了我照顾的两个女孩子，17岁的永清和15岁的永洁外，还有你的亲戚肥仔，瘦子等。”（肥仔是廖承志，瘦子是经普椿）宋庆龄在1974年6月2日致廖梦醒的信中说：“陈乙明和他的家人将于7月5日到京。7日晚我设家宴欢迎他们。如果你能来，请在六点半到我这里。你的弟弟和阿普也要来参加，因为他们帮陈办过签证等事宜。（阿普即经普椿）……路易、马海德，也许还有其他陈乙明的朋友会来参加。”

但是由于邓先生不能与陈乙明同时

到达，而是7月10日晚上才到北京，于是宋庆龄将宴会时间改在了7月11日的晚上。她在7月1日致廖梦醒的信中说：

“那个大家宴不得不改在7月11日了。因为邓广殷也要来参加。他与陈乙明的家人7月5日到不了。邓与他的女儿（不是与他的妻子）和他的几个朋友10日晚上10点钟才能到达，所以11日下午六点半是我们聚会的日子。”

7月11日晚上6点半，邓先生带着女儿邓勤如约来到宋庆龄寓所，除了熟识的陈乙明和他的家人以外，宋庆龄邀请的柯弗兰夫妇、路易·艾黎、马海德夫妇、阿霞都是邓先生的朋友。他们都是宋庆龄宴会上的常客。这天晚上，大家欢聚一堂，气氛十分愉悦。宋庆龄非常开心，称这次宴会为“大家宴”，还戏称7月11日就好像是“儿童节”，因为小孩比大人多。上述的几张照片，便是这欢聚时刻的见证，来参加这个“大家宴”的人，尽管有着不同的年纪，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国籍，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被宋庆龄的精神品质和高贵人格所吸引而紧密团结在她身边的，也是宋庆龄与各位友人深厚友情的见证。

宋氏墓地变迁略考

撰文 / 王宁宁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以下简称为宋庆龄陵园）的宋氏墓地内，安葬着宋耀如、倪珪贞、宋庆龄和李燕娥四人。

宋庆龄陵园原为上海的万国公墓。这一公墓初名薤露园，由浙江上虞人经润山在上海西乡（今虹桥路、沪杭铁路西侧）购地 20 余亩筹建而成。经润山病故后，该园渐被沪杭甬铁路占用。1917 年，经润山的妻子汪国贞在虹桥路南、张虹桥购地 55.6 亩，将园西移，更名为“薤露园万国公墓”。万国公墓，指不受国籍、种族、姓氏等限制，中西人士皆可安葬的公共墓地。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万国公墓中都安葬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宋氏一家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一、宋公耀如之墓

万国公墓中的宋氏墓地是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在 1918 年出资购买的，宋耀如在上海病逝后即安葬在此。据万国公墓公布的资料，宋氏墓地共有 22 穴。^[1]据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张珏回忆：宋庆龄

父母、兄弟姐妹 8 人，有“约定”死后葬在一起之说，解放前万国公墓宋氏墓地除有宋庆龄的父母宋嘉树、倪珪贞的合葬墓外，另有宋家子女 6 人的寿穴。宋庆龄不忘“约定”，希望身后永远陪伴父母。^[2]宋耀如购买的这些墓穴成为后来宋氏墓地的基础。

1918 年 5 月 3 日^[3]，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病故，此前，宋庆龄已由广州回到上海，宋氏三姐妹一直守护在父亲身边。^[4]父亲病故后，宋庆龄一直在上海，直到办完丧事。1932 年宋庆龄与宋子安祭扫父亲宋耀如墓时，曾经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展示了宋耀如的墓碑的和周边环境。因时间久远，墓碑上的刻字已经不太清楚，但有些仍然可以辨认出来。墓碑左侧刻有宋耀如的生卒年月及宗教身份，墓碑中间刻有墓主名字，右侧刻有立碑人。经笔者极力辨认，可以确定的有“生於同治五年□月二日 歿於民国七年五月四日 监理会 宋公耀如之墓 男子文 子良 子安立石”。



▲ 1932年宋庆龄与宋子安在父亲宋耀如墓碑旁

关于宋嘉树的出生年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1）1861年10月，见韩拱丰等执笔《宋庆龄原籍考实》，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2006年）也取信此说；（2）1863年2月，见《宋庆龄宗亲初考》（宋庆龄生平展览文昌展出委员会编）、刘家泉《宋庆龄传》、于醒民等《宋氏家庭第一人》；（3）1866年，见罗比·尤恩林《宋氏三姐妹》。宋耀如的出生年月已有多年争论，笔者无意在此展开，在墓碑上镌刻的生卒年月，至少代表宋耀如或者宋家人是认可这一时间的。令人奇怪的是，宋耀如的去世时间刻为1918年5月4日，将学界一致认可的1918年5月3日推后了一日。笔者仔细翻阅了推出此说的《宋氏三姐妹》和《孙中山在上海》二书，里面并未提到这一卒年的出处，只是肯定的描述，

不知数据从何而来。笔者认为墓碑上的去世日期更为可信。

墓碑上留有“监理会”的名号，表明了宋耀如的宗教身份。墓碑上的立碑人仅为宋家的三个儿子，子文、子良、子安三人，一是可能受当时社会习俗影响，二是当时宋氏三姐妹还没有展现出后日的影响力。

二、宋耀如、倪珪贞合葬墓

1931年7月23日，宋子文在上海沪宁车站出口处遭枪击。正在山东青岛养病的倪珪贞误以为长子遇刺身亡，于当日下午逝世，享年63岁。7月29日，灵柩从青岛移至上海西摩路宋宅。彼时，宋庆龄正在德国柏林。接到孔祥熙电报后，宋庆龄于1931年7月31日从德国柏林返国奔母丧。8月18日，除宋子文

夫人因身体不适未参加外，宋氏兄弟姐妹全都参加了母亲的葬礼。^[5] 倪珪贞的墓穴在万国公墓的公墓礼堂前左首，傍宋耀如西侧，穴深5英尺，穴内铺以水泥，四周铺以青草。灵棺上覆以青天白日党国两旗，放置墓穴内后，有墓穴石板5方平铺于上。^[6] 在1932年宋庆龄与宋子安在父亲宋耀如墓旁的合影中，还未看到合葬墓地动工的迹象。1932年8月，宋氏兄弟姐妹一起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为父母宋耀如、倪珪贞建合葬墓。墓碑由3块花岗岩拼接而成。建成后的宋氏墓地计约145平方米，东西两侧石栏上各有石屏风一座，围墙后植龙柏，墓盖为大理石。^[7]

早年，宋子文夫妇在父母墓前探望时，曾留下一张合影。这张留影较为清

晰地展示了当时墓地的情况。其中墓碑上的刻字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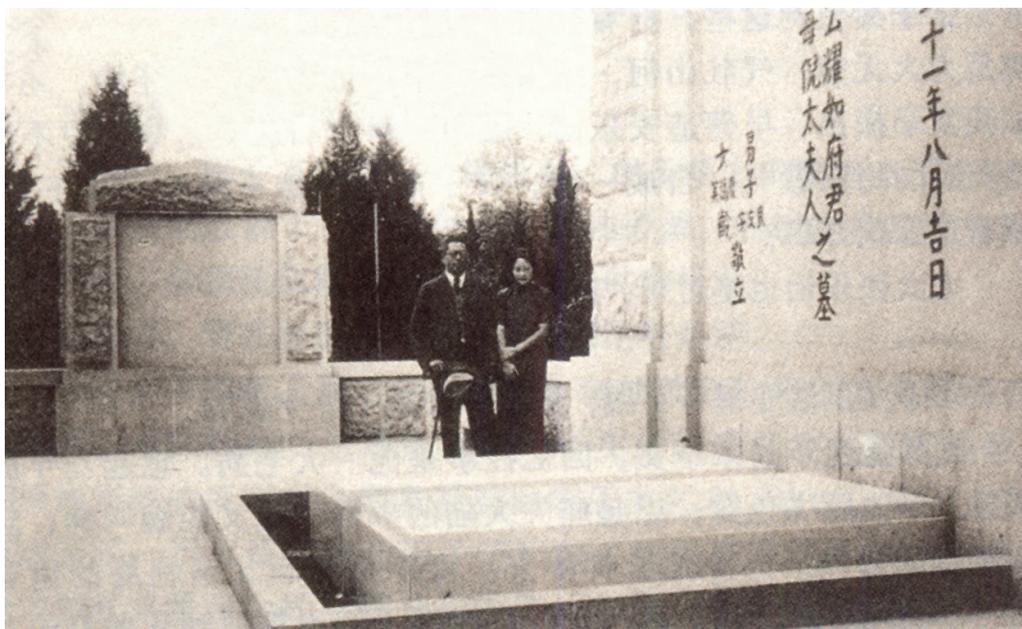
顯考 宋公耀如府君 之墓

妣 倪太夫人

男子 安文良 敬立

女 美齡 敬立

墓碑左侧只刻有立碑日期，并未刻意强调宋氏夫妻的宗教信仰。在墓碑的右边，宋家子女6人的名字全部在立碑



▲ 早年，宋子文与张乐怡在父母墓前

人之列。

三、文革中被破坏后暂时修复的宋氏墓地

1967年1、2月间，宋庆龄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砸毁，墓盖、石栏等地面建筑均被拆毁，墓碑中刻有日期和宋庆龄兄弟姐妹名字的左右两块被毁，中间刻有宋庆龄父母名讳的一块幸存下来。^[8]宋庆龄得知情况后，心里十分难过，立即派人叫廖梦醒来寓所。她给廖看了被毁墓地的照片，并请廖立即把照片转交邓颖超。邓颖超接到转来的照片后，遂于3月13日致函廖梦醒，“据了解，在一月中旬到二月上旬期间，上海六十二个公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烈士墓园也波及，在被劝阻后

才未扩大……上海方面已将宋副主席父母坟墓现场所拍的照片送来，现送上请转宋副主席。除已将她前次的酌情处理意见告知上海方面，在她看了现场照片后，是否可提出处理的意见，望告。我和恩来同志看了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因为遗体 and 遗骨已经又埋入墓穴了，是否就在墓穴上面加工覆盖好。墓碑并没有破坏，仍照旧保留，只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改刻宋副主席一人的名字。如果把遗体 and 遗骨挖出来火化，恐难挖全。究竟如何，请宋副主席考虑。”^[9]廖梦醒把邓颖超的信和照片交给了宋庆龄。1967年9月，上海市民政局根据周恩来的来电指示，对宋墓进行了修复。重立的墓碑仅刻宋庆龄一人名字。^[10]故居保留着一张宋氏墓地的照



▲ 文革期间恢复的宋庆龄父母墓

片，据笔者推测是文革期间修复的宋庆龄父母的墓地。从这些照片来看，修复后的墓地并未保留墓碑中间的墓主称谓，而是重新刻了一份有宋庆龄父母名讳“宋嘉树 倪桂珍之墓”的墓碑，并刻上“宋庆龄敬立”的字样。其中宋庆龄的母亲的名字用的是“倪桂珍”，其父的名字用的是“宋嘉树”，在他之前的墓碑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写法，宋庆龄在当时再未提出任何意见。

四、李燕娥的墓地

1981年2月5日，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宋庆龄亲自安排她的后事，她请保姆钟兴宝向秘书杜述周传达指示：一、李燕娥骨灰，火化后拿回家里来，因李不喜欢八宝山。二、自己回上海时骨灰盒带回上海。三、李燕娥骨灰安葬在花园或安葬在自己母亲墓旁边。^[11]这是宋庆龄对李燕娥墓地的初步设想，后来的情况是1981年2月13日，宋庆龄再次致函杜述周“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记得我家在那里有八穴地。你请李局长办事最好的了。原来那里有大理石的碑，‘文化革命’时被人破坏了。我能再做过他们的碑。但是李姐要做得同样的。我不知道怎么样谢李局长，请他办好事来一个照相为荷。”^[12]该信中明确表示要将李燕娥的墓放在宋氏墓地中。2月16日，沈粹缜来北京寓所探望。宋庆龄

邀沈一起去看宋的北京寓所的李姐的骨灰盒。一再叮嘱沈粹缜：“要为李姐立碑，写上‘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13]

在1981年3月8日，宋庆龄致沈粹缜的信中提到“看上去管理局一定忙得很。我不知道一两天的工作怎么还未完成，可能他们要画图形等等。依我看一天就可以安葬她，然后装她的石碑。现在她已过世了一个月零七天，墓还没有做好。或许他们要做得好看。那是绝对不应该的，因为我的父母也葬在那里。李姐像我们一样是比较小一辈！”^[14]宋庆龄非常心急，希望李燕娥的骨灰可以快些入土为安。但是因为墓地开挖所需的步骤繁多，所以事情并未像宋庆龄预想的那样快速。

3月中旬，李家焯将李燕娥的骨灰带回上海，并由民政局进行安葬的准备工作。3月16日下午，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会见沈粹缜，商谈修建李燕娥墓的方案。沈粹缜带着宋氏墓地和李燕娥墓的图纸，详细汇报上海有关部门安葬李燕娥骨灰的打算，宋庆龄“戴上眼镜，细细观看图纸。边看边谈到她记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顿了顿，又指着图纸说，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我的。因为是小辈，都要比父母的墓穴低一些。”^[15]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李燕娥墓的位置是宋庆龄定的，她要求自己以后的墓要一样的大小，同样的位置，不同的方向，一个东面，一个西面。4月2日，李家焯等人在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为李燕娥举行



▲ 1981年的宋氏墓地

了骨灰安葬仪式。4月4日，沈粹缜从上海赶来北京，给宋庆龄带来李燕娥骨灰安葬仪式的照片。^[16]建造好的李燕娥墓在宋庆龄父母墓地的西侧，长120厘米，宽60厘米，墓碑上镌刻着：“一九八一年二月 李燕娥女士之墓 宋庆龄立”的字样。^[17]宋庆龄为此专门致信李家焯表示感谢：“四月二日关于李姐的安葬仪式而写的信收到。感谢你为这件事的操劳。”^[18]

五、宋庆龄安葬后 基本恢复原状的宋氏墓地

宋庆龄一直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应该独自葬在中山陵，永远接受人们的瞻仰和纪念。^[19]她在处理

李燕娥后事时交代了要将自己的骨灰安葬在父母的身边。

李燕娥墓建成后，市政府秘书长张甦平又要求按原样对宋墓作进一步修复。按照市政府的要求，宋墓的进一步修复工程于4月14日正式动工。^[20]

墓地按“文革”前宋庆龄父母墓的原样进行修复，墓碑照原样刻上当时所有立碑人的字样。宋庆龄父母墓的两块大理石墓盖是由上海大理石厂重新制作的。修复工程由万国公墓的主任郑锐和职工李通海联系负责，在他们的努力下，工程于1981年5月底竣工，基本恢复了原貌。修复后的从原来的22穴约145平方米扩大到195平方米。^[21]墓地的墓碑部分与宋子文夫妇所拍摄的照片做一比

对，复原的相似度较高，但严格看来，仍有部分不同，如墓碑周边围绕的大理石形状和结构有些不同，另外墓地东西两侧的石屏风也未复原。

宋庆龄墓位于她父母墓的东侧，墓的大小、位置与李燕娥墓完全一样。墓碑采用卧碑式，花岗岩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宋庆龄从此长眠在这里，她将永远陪伴她的父母。



- [1] 李家炽：《我所参与的宋庆龄国葬准备》，参见《为了永恒的纪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 [2] 张珏：从《宋庆龄生前谈孙中山》，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参见《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8页。
- [3] 此日期存疑。
- [4] 《宋氏家族》，第120页，参见《宋庆龄年谱》，第157页。
- [5]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9日，《申报》1931年8月19日，参见《宋庆龄年谱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
- [6]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8月19日，《申报》1931年8月19日，《胡兰畦回忆录》，第232页，参见《宋庆龄年谱》，第449页。
- [7][20] 孙娟娟：《宋庆龄陵园建设的前前后后》，载《纪念宋庆龄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页，第360页。
- [8][17][21] 童洁：《筹备宋庆龄国葬的日日夜夜》，参见《为了永恒的怀念》，第20页，第21页，第21页。
- [9] 《宋庆龄年谱》，第1715页。
- [10] 廖梦醒：《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40页；《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第290—291页，参见《宋庆龄年谱》，第1716页。
- [11] 《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参见《宋庆龄年谱》，第1987页。
- [12] 《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7页。
- [13] 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1页，参见《宋庆龄年谱》，第1989页。
- [14]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8页。
- [15] 《杜述周回忆材料》，未刊；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0-171页，参见《宋庆龄年谱》，第1994页。
- [16] 沈粹缜：《我的追念》，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71页，参见《宋庆龄年谱》，第1996页。
- [18] 宋庆龄书信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412页。
- [19] 张珏：《宋庆龄生前谈孙中山》，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参见《宋庆龄年谱》，第1988页。

谈纺织品文物的保存方式与陈列提用

撰文 / 徐建华

纺织品文物在我馆库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些文物不仅包括宋庆龄穿过的服饰，还有一些衣料、鞋、帽、包等等。这些文物有的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需要精心保存。笔者根据自己这些年来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谈谈纺织品文物在分类保存和陈列提用时的一些想法。

我馆的纺织品有以下几类：

1. 平面类

我馆存有许多布料文物，皆为此种平面形态。表面有装饰物的纺织品要注意，不要与其他物品的表面发生摩擦。由于有装饰物的存在，纺织品文物可能会比较重，移动时也要特别当心。

2. 服装类

服装是我馆纺织品的主要存在形式。其存放可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服装的重量、牢度、空间及材料等。

3. 服装附属物

如纺织类的鞋帽、箱包等服装饰物。它们大部分是三维立体物品。三维物品

存放时，由于自重的影响会产生变形而使文物损坏。所以，保存时应辅以一定的填充物，或者用模具来支撑。

一、库房保存

1. 纺织品的包装

纺织品进入库房存放之前要做好包装，我馆采用的纺织品包装基本都为封罩型，以采购的棉布防尘衣罩为主。

封罩的功能在于隔绝尘埃光线，避免与其他文物有不必要的接触。防尘罩的尺寸根据文物尺寸而定，对于那些下摆较长的服饰，可以采用下摆封闭的防尘罩。当然，这种防尘罩也可以用于较短的服饰的保存。

另外还可以采用囊匣或盒箱来保存纺织品。对于一些质地脆弱的纺织品，应该制作囊匣以利保护。用无酸卡纸制作的纸盒，经常用于收纳小件三维服饰。用相对较厚的纸板所制作的较大纸箱，经常用于盛装大件的服装。也有用有机玻璃制作的圆筒盒，常用于卷轴的收纳。

2. 库房里的布局

我馆主要采用的是密集型柜架。这种柜架多用于展贮大件平面纺织品，由金属材料或木材组合而成。制作考究的密集型柜架，一般在地面铺设钢制轨道，柜架排列于轨道上，借助机械传动，柜架可以任意在轨道上移动。平时柜架密集排列不留空隙，需要检查提取存放文物时，可随意选择任何一个单元，文物可沿轨道自由抽送检查、观赏、展示，是一种与贮藏完善结合的形式。这种密集型柜架既能扩大文物的贮藏量，又充分利用库房空间。

3. 存放方式

纺织品文物由于形态结构不同，所采用的存放的方式也不一样。我馆曾经采用过以下几种方式保存。

(1) 平摊式保存

所有的纺织品文物都可采用平摊式保存，这种方式可以使纺织品纤维获得最大程度的放松，因此是一种最为理想的保存方法。由于平摊式保存比其他形式的存放方法占有的空间要大，所以要有选择地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来说，那些十分残破但价值极高的纺织品，或是十分厚重、无法卷曲或悬挂的纺织品，适合采用平摊式保存。除了平面纺织品、平面剪裁的服装外，一些小件的立体类服饰也可以采用此法。

将纺织品平摊放入橱柜抽屉中，注意尽可能减少纺织品的折叠次数，如确实因物件太大而必须折叠时，应在折叠

处衬垫纸卷或其他缓冲物，减轻折痕。如大袍，一般是在两个衣袖处和腰部各折一次，其他尽量少折。

(2) 卷轴式保存

对于能够卷曲的纺织品，对于庞大厚重的地毯，最切实可行的保存方法就是卷轴式保存。应该注意，对于表面极其精细的纺织品，如刺绣，不可以采用卷轴式存放。卷曲的方法无外乎二种——正面朝外，或者正面朝内。一般来说，当正面和背面状况一致时，正面比背面更需要保护，因此常采取正面朝内卷曲。如果背面比正面脆弱，或者背面缝缀有背衬则需要采用背面朝内卷曲。卷曲有背衬的地毯时常会出现皱折，此时应注意尽可能地将皱折积累到背衬上。如果纺织品为绒织物，在卷曲时应该顺着绒方向，同时确保绒面朝外。如果纺织品上有流苏或缨穗等装饰物，应事先用无酸纸加持固定。在卷曲过程中，应该随时注意纺织品的经纬是否处于顺直状态。

当纺织品十分厚重时如地毯等文物，卷曲时很难将之服帖的卷到卷轴上去，此时可以借助一块洁净本色棉布（宽度比所卷纺织品略宽）将纺织品引导上卷轴。具体操作时，先将棉布卷在轴上，余出一段与纺织品重叠，继续卷曲，顺势将纺织品卷上轴。卷曲时要尽可能保证经线垂直于卷轴，必要时可加一些衬垫。

卷曲完后，在外层卷上一段棉布，用

于防尘避光。棉布要宽到能塞进卷轴两端的孔内为宜。最后用棉带捆扎，确保卷轴不会松散。事先可以用永久性墨水在棉布封套上作标记，每隔几年要清洗封套。

(3) 悬挂式保存

对于平面纺织品来说，悬挂式保存是一种非常节省空间的保存方法，此方法也经常用于陈列展览。但是选择何种悬挂材料是非常关键的，所选用的材料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以避免纺织品自重产生的张力对其本身造成损害。

悬挂式保存使用很普遍的一种工具就是衣架。对于纺织品文物，其悬挂方法有特定的要求，所用衣架由木头或塑料制成，在具体使用时，要根据不同服饰的要求来调整衣架的形态，使衣架和服饰之间的作用力减至最小。最好事先准备一系列不同型号和尺寸的木头或塑料衣架，然后根据不同服饰要求，从中选择一个最佳衣架。切忌使用金属丝制成的衣架，它不仅不能为服饰提供足够的支持，还可能发生金属锈蚀沾污服饰。可以用聚酯泡沫包裹衣架，使之丰满厚实、转角平滑，从而使服饰的重量能够均匀分布于肩部。用聚酯泡沫包裹完毕后，还要在最外面包裹一层本色棉布。

对于某些剪裁简洁、线条流畅的服饰，可以采用直杆式衣架。有时为了全方位的立体纺织品的美感，可以采取模特式。如果现有模特比服饰小，可以通过修饰使其适用。首先量取服饰的关键尺寸，如臀围、腰围、胸围、肩宽、肩

至腰的距离，数据尽量准确。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使模特合体。然后在模特上套上一层筒状梭织物。在相应部位填充聚酯泡沫，是模特的尺寸最大程度地接近服饰，然后用针固定，修饰即告完成。

4. 贴标签

在纺织品入库登记时，贴总登记号标签是必不可少的一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标签的材质最好为白色棉布，用记号笔写上编号。

(2) 用白色棉线钉标签于纺织品上，针脚越少、越细，对纺织品的保护越有利。千万不要用有粘性的标签，这样容易引起纤维的损伤。

(3) 贴标签的位置根据纺织品的种类不同而分为两类。普通的平面织物钉在背面的左下角；对于服饰，上衣钉在领口内侧，裤子钉在腰部内侧。一般而言，标签都要钉在同一个部位，这样容易检索，另外可以避免因寻找标签而引起的纺织品的损坏。

(4) 此外，在储藏纺织品的抽屉柜子以及箱子上也贴标签，有条件的话可以将照片放上去。这样提取纺织品就方便多了，也对纺织品的保护有利，避免为了寻找而翻动物物。

5. 储藏环境

纺织品文物几乎都是天然的有机质，对环境比较敏感。库房的管理人员尤其要注意：

(1) 现代库房一般都有空调和加湿

除湿设备，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温湿度仪观察来调节室内的环境，并做好记录。

(2) 库房里的文物在储藏过程中尽量不要见光，随时将窗帘挂上。在移动的时候也尽量使纺织品少受光照的影响。

(3) 特别大的纺织品需要卷轴存放。卷轴的直径尽可能大，从而减少卷绕圈数。卷轴要比纺织品长，可以保护纺织品两端。

二、陈列提取

陈列是博物馆纪念馆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衡量博物馆纪念馆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在陈列布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原则是展品必须处在危险最小的环境中。

1. 提取

从库房提取纺织品用于展览时，必须小心谨慎。首先带上白色的棉手套，也可以用肥皂洗净双手并干燥。另外，不要佩戴任何装饰品，如戒指、手镯等，它们可能会钩挂纺织品而引起损害。无论纺织品的强度如何，都必须在提取时有支撑物。不同的纺织品提取的方法有所不同：平面的织物放在干净的木板或托盘上，大件的需要两人协作移动；在提取卷轴时，用手握住轴柄两端。最理想的方法是将纺织品放在箱子里提取。在提取过程中，两手抬起的高度不能过肩，否则容易重心不稳而掉落纺织品。决不要提取纺织品某个角落，要平衡地支撑纺织品。

2. 库房到展厅的运输

无论库房位于何处，也必将有一个运输过程。在办理了一系列手续后，提取人员应当确认藏品的基本信息，包括形态、大小、颜色等，并记录在案。接着按照藏品的品种或大小分类，将小件的织物整齐的叠放在密封的箱盒内，叠放层数不宜过多。对于大件的藏品，诸如服饰，可以折叠成相对小的面积，但是折数尽量少，然后再放入箱盒中。其他如已经制作成夹封或镜框的藏品，可以直接运输。在运输过程中避免强光、高热、雨水以及腐蚀气体等。

3. 展柜准备

一般而言，纺织品都是放在展柜里陈列的。因此，展柜的环境非常重要。

在陈列布展前，首先应当打扫展柜的卫生。由于展柜是相对密封的环境体系，灰尘不易进入也不易出来，布展前必定会有一段时间使展柜内外环境发生交换，因此需要及时清洁，然后关闭展柜。

4. 布展中的注意事项

在布展过程中，陈列的形式对纺织品造成的潜在的危險主要是物理损伤。为了使观众对展品有更好的了解，平面的纺织品往往是倾斜摆放的，所以需要固定，通常的做法是将织物用针线钉在包有棉布的木板上，在达到稳定的前提下，针脚尽量可能少。对于某些展览频率比较高的纺织品，可以直接做成镜框储藏。近代展品因强度比较高，可以吊挂或是穿着在模特上。在今年我馆举办



▲ 用模特展示宋庆龄穿过的羊毛开衫

的服装陈列上，我们就采用了衣架悬挂，并不断调整衣架形状，使衣架和服饰之间的作用力减至最小。有些脆弱的服饰就平摊在展台上。为了展示某些立体服饰的美感，一些文物使用了模特展示。

5. 陈列期间的维护

相对于储藏，陈列过程中最大的自然损害来自照射的光线。长时间的灯光照射可能会发生褪色情况，应当及时调节灯光强度或替换展品。精致的展览和纺织品保护往往是矛盾的；观众希望能

够清楚地看清展品（需要足够充足的光线），而纺织品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光线越弱越好）。特别是紫外线，不仅能使纺织品褪色，还能使纤维老化。选择合适的光线强度是非常重要的。

展览过程中还应注意展览道具装饰品摆放情况，因为为了达到最佳展览效果，道具的安置往往不是最稳固的，一旦倒落或反倒，会损坏藏品。

再者，陈列人员应当检测展柜的环境，特别是温湿度，如果发现检测结果偏离理想的环境标准，需要及时调节。布展结束后，要定期检查藏品的陈列情况。

纺织品文物可能会处在库藏、陈列、修复、研究等各个环节中，不管它们在何种状态下流转，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都是我们要做的最基础的工作。今天我们的库房存放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只要我们严格地科学管理保护好各类质地的文物，就能延长文物的寿命，发挥其文物的价值，最大化地为社会服务。



参考书目：《博物馆藏品征集、保护、陈列艺术及内部管理实用手册》，银声音像出版社 2005 年版。

故居文物保护工作中的 白蚁防治

撰文 / 毛正东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主楼建于上世纪20年代，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假三层西式建筑，院子四周有数十棵百年香樟树，红瓦白墙的主楼掩印在绿树丛中，精致而典雅。但即便是这样优美的院落也会有白蚁侵蚀的隐患。因此做好故居的白蚁防治，是保障故居文物安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白蚁对故居的潜在危害

白蚁是世界五大害虫之一，被称为“无牙老虎”。它的主要食料是木材等含纤维的物质。白蚁的危害相当隐蔽，它可以把木材蛀成空壳，而外表很少露出痕迹。早期一般不易察觉，一旦被发现，后果已经非常严重，所以破坏力十分强大。白蚁是危害建筑安全的一大隐患，特别是像故居这样的砖木结构的老建筑，白蚁对梁、柱、地板、护墙板、门框、窗框等都会造成破坏。长期遭受白蚁蛀

蚀和危害，轻则破坏房屋结构，重则会造成房屋倒塌。可以说白蚁是故居潜在的“隐形杀手”。

除了建筑外，白蚁对树木的危害也不小。受白蚁啃食的树木，往往会加剧衰败直至整棵枯死。故居院落四周有数十棵百年香樟树和其它植被。香樟树是故居最有代表性的植物，但同时也是白蚁最喜欢的树种之一，因而最易遭到白蚁的侵害。一旦这些标志性的树木被蛀空枯死，那对故居整体风貌将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白蚁的食性很杂。如果不注意防护，故居内保存的纤维类藏品也会受到白蚁的侵害，埋在地下的塑料电缆和电讯设备也会被蛀食。可见白蚁危害的隐蔽性、广泛性、严重性是不可小觑的，看似很小的东西也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故居发现白蚁的种类及危害特点

历年来在故居院内多次发现白蚁活动的迹象，主要集中于两种白蚁，一种



▲ 家白蚁



▲ 黄胸散白蚁

是家白蚁，另一种是黄胸散白蚁。这两种白蚁都是上海地区最常见的蚁种。

家白蚁是破坏建筑物最严重的蚁种，它的危害特点是扩散迅速，群体大，破坏力强，而且能在短期内造成巨大损失。家白蚁严重威胁砖木结构建筑的健康，它们不仅能在柱、梁、龙骨等木结构进墙部位营巢，也能在基土层里筑巢，给建筑造成危害。

黄胸散白蚁是破坏建筑物分布最为广泛的种类，它群体小，活动范围大，危害分散。主要危害木门槛、木门框、窗框、踢脚板、护墙板、柱脚等建筑的

木质装饰件和木质家具等物。据说有 90% 以上的古建筑是被散白蚁危害的。

存在白蚁隐患的原因

1. 白蚁的生存、繁衍、危害程度与地理、自然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庆龄故居地处上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这种优越的气候环境也为白蚁的生存和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非常适合白蚁的滋生。特别是春秋两季白蚁危害最为严重。

2. 砖木结构的故居建筑，其本身结构和设施存在着有利白蚁发生的条件，如含有大量的纤维素类物质的食料，是白蚁赖以生存的主要场所。如果长期渗漏维修不及时，使木结构和墙体处于潮湿环境，会给白蚁的繁衍创造有利的环境。木屋沿长年外露；墙体内木柱直接接触土壤等原因，也会使环境中生存的白蚁能顺利到达木构件中，并选择适宜的部位生长、繁殖，发展群体。

3. 故居环境绿化覆盖率高，四周有数十棵百年香樟以及其它植被。落叶、枯枝、死根，长期置于露天之下，腐朽后成为白蚁喜食的材料，给白蚁的生存与繁衍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白蚁纷飞繁殖季节，外部的白蚁也极有可能凭借自身繁衍后代的本能，利用这种有利因素，飞入故居内创建新的白蚁群体形成危害。故居的樟树又是白蚁最喜欢啃食的树种，加上这些樟树又是生长较弱的

高龄树木，树龄越高就越容易患上蚁害。

白蚁防治的措施

历年来故居管理者对白蚁的防治工作一直很重视，在白蚁防治中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譬如，对故居多棵有空心洞和大的创伤面的樟树，采取涂刷防蚁药剂后，再用水泥砂浆堵塞修补的办法，防止了白蚁入侵筑巢造成的危害。又如，故居在历次维护修缮工程中，也把白蚁防治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使主体建筑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再受白蚁的危害。平时相关部门还定期请白蚁防治所的专业人士为故居进行全面体检，落实防治措施，制定居白蚁防治预案，具体措施是：

1. 重点时间重点管理。根据白蚁的生态特性，黄胸散白蚁每年3-4月份出飞繁殖，家白蚁每年6-7月份出飞繁殖。在这4个月中白蚁活动频繁，同时也是发现和消灭白蚁踪迹的最佳时刻。在这个阶段联系专业白蚁灭治单位作好定期巡视查勘，达到早发现、早消灭的最佳效果。

2. 重点区域重点管理。绿化地带对杂草、灌木、枯叶、枯枝及时清理，减少白蚁滋生条件。同时在特定区域定位设置多处白蚁诱杀装置，定期检查。这样一方面通过用白蚁喜欢的饵料将白蚁引诱聚集，远离主体建筑和古树名木，

同时在诱杀装置白蚁达到一定数量时便于集中杀灭白蚁。

3. 加强学习，早期预防。组织单位相关人员学习白蚁生态知识，便于在日常管理中早期发现白蚁踪迹，化被动为主动，利用白蚁趋光现象，夜间布置灯光诱杀装置，防患于未然。

加强白蚁防治工作的 几点建议

这些年我们确实在白蚁防治中做了不少工作，但对故居而言，白蚁防治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才能防患于未然。所以我们要还应不断完善工作，提高水平。

1. 进一步明确白蚁防治在故居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制定整体运作规划，确保在制度上支持，经费上有保证。

2. 在白蚁防治工作中，必须遵守文物保护的原则，尽量控制、减少对建筑的损坏，确保故居的原貌和历史价值。

3. 建立白蚁防治的“健康”档案，记录故居在日常维护、检查中发现的白蚁活动迹象、灭治方法。特别是每年的专项检查中专业部门的防治报告都要有案可查。

4. 保护好故居的生态环境，让鸟类、蝙蝠、蚂蚁、蜥蜴、青蛙等白蚁的天敌们帮助我们一起控制白蚁的危害。

库房搬迁札记

撰文 / 花婆婆

文物搬迁工作迄今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档案馆库房和综合库房的文物搬迁已经基本完成，进入库房消毒阶段。在我的文博职业生涯里，有幸经历这样一次搬迁，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现在回望，觉得这段日子是非常值得记录下来。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9次大规模搬运，十余次小规模搬运。每一次搬运都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和体力。

去年6月份，我们开始着手搬运工作。清点从瓷器开始，首先清理了库房最里面的17号柜，因为盒子大小不一致，而周转箱容量小，现有的三个周转箱装不了多少文物就满了，装箱推进工作遇到瓶颈，试了多次也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办法，工作无法进行，只能等管委会的箱子做好再做打算。经过这次摸索，发现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要购买一些辅助用品，像文件袋、书写板、书写粘纸之类的。到8月份，我们开始清点纸质类文物。与此同时推进的是文物囊匣的制作，这次两个师傅跟我们一起进去。

到了库房，一位同事协助他们做盒子，量尺寸，画图，我和另一位同事开始清点纸质类文物。装文物的盒子很重，拿了几次手就有些发酸了，因为条件所限，也没有工作台，拿了一个柜子当台子，每次都要站很久。8月中旬时，因为有两位同事要去湖南布展，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事留下清点。我俩点完纸制品后，继而开始清点棉织品，因为靠垫较多，体积较大，清点完后无法放归原处，打算等大的周转箱运来后再清点装箱。但是周转箱很重，两个女生也没办法工作。后来部门副主任决定调整工作，先把纸制品装箱。我们试装纸板箱时，发现文稿只能装下四盒，两边都要衬填补的材料，相册可以放11本，一侧填充气泡棉，于是就决定先装照相册。为了给装好的纸板箱腾地方，空的文物柜暂时运送到周转库房存放。在我们装箱的同时，瓷器囊匣也陆续完成，我负责给囊匣写总号，因为囊匣的颜色过深，我们特别购买了白色的记号笔，但是效果并不好，再次制作时就让他们调换了囊匣的外包

装颜色。瓷器囊匣陆续做好后，我们开始陆续将它们装入周转箱。囊匣因为大小不一致，要不时调整，装入时还要记录，这一过程中生怕漏了瓷器。我和同事同时记录，等回馆核对。

10月份，搬迁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终于拿到了新库房的钥匙。进门很复杂。先要刷电梯卡上二楼，而后进入风淋再进库区，进库房前先转机械锁，再刷IC卡进去。10月底，我们去新库房办理人脸识别，搞好以后和保洁人员一起进库打扫卫生，没想到密集架那么脏，上面很多灰。我们将密集架的抽屉柜都用吸尘器吸了一遍，边上的铁架都仔细地擦过，那天做到很晚才结束，非常累。馆领导下午来看过，提了一些意见。为了怕把地板刮坏，她们建议搬的时候铺一些地毯。在搬运前，我们将工作台运了进去，门禁实在是太复杂，弄了1个小时才全部装进去。

新建的文物库房与以前相比有着很大的优越性，二楼标准库房恒温恒湿，并且配备了气体灭火装置，非常适宜珍贵文物的保存，另外一楼普通库房也可存放一般文物。但是新库房还是有一些不足，如库房内采光不佳，一些地方因为密集架过高，灯光被完全遮挡住，下面存放文物的总号完全看不清，要借助外部的采光设备才能工作。库房电梯也过于狭小，对于搬运文物来说非常不利。二楼库房门与人脸识别的大门距离过近，搬运文物时非常别扭。虽然已经分给了

我们最大的库房，但是对于我们的文物存量来说还是不太够，想要完全摊开还很困难。为此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10月31日，我们去档案馆，将所有装好的周转箱都贴了封条。有一个箱子盖子的螺丝拧不上去，一位同事只好又去拿了一个周转箱来换。弄出来容易，装进去又用了好半天。我们把未清点的部分与要搬运纸板箱的部分隔开，以保证搬运时不拿错。最后清点了一下数量，一共8个周转箱，87个纸板箱。11月5日下午，领导给我们开了搬迁动员会。传达了搬迁的要求，明确分工，专人专责。两位同事在档案馆库房负责发送箱子，一位同事负责电梯上下，部门主任负责装卸的安排，馆领导负责档案馆库房的现场指挥，我和另一位同事在新库房负责接收文物。办公室负责后勤保障，保卫部负责车辆的安排及联系武警进行押运。一切就绪后，11月6日，我们迎来了第一次搬运，早上七点三刻，我们一起坐面包车去了档案馆库房，9点钟，领导和我们部门两个成员去了新库房，10点半货车终于载着文物来了。等他们把纸板箱运来以后，我赶紧对照清单把运来的“勾掉”，一共运来30个纸板箱，8个周转箱。等搬运工弄好撤出去后，我们就开始开箱核对文物了。因为其他部门人员的帮忙，很快就完成了。中午吃完饭，两位部门领导跟搬运的人把周转箱运回了档案馆。这次搬完之后，又进入了紧张的打包环节，接下来清点装箱

的是书籍。第二次、第三次搬运仍旧各运了8个周转箱30个纸板箱。周转箱靠墙靠走廊放，纸板箱靠墙靠密集架放。全部放好以后照例是将周转箱里的文物取出来，把箱子运回去。后来因为瓷器已经基本运完，我们开始打包书画和棉织品。第四次搬运共运了27个纸板箱，8个周转箱，因为大家体力不济，时间紧张，有些书籍没来得及装箱。而且新库房地方有限，在每一次装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同时进行文物上架。因为原定的密集架搁板间距过小，我们把它做了调整，架子都很重，这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先上架的是照片册，然后是书信文稿，这部分文物因为已经全部运来了，而且包装较好，上架方便。后来大部分书籍运过来后，就直接开始上架，经历了两次搬运，一些书籍的状况不太好，我们购买了书籍保护盒，希望可以改善它们的保存环境。12月份开始，因为需要周转箱周转，我们将箱子里连号的部分棉织品先上架，没有连号的文物暂时存放在密集架上保存。

当时因为瓷器的囊匣没有全部完成，所有的瓷器暂时堆放在库房一侧的空地上，工作难以推进。今年1月底，经过无数次的努力，瓷器囊匣基本制作完成，库房上架提上日程。以前的总号都写在囊匣底下，找起来很麻烦，影响了上架的速度。所以我打印了瓷器总号贴纸，准备贴在侧面，这样找起来能快一些。因为瓷器较多，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

都去新库房报到，到了2月中旬，所有的瓷器上架完成，打扫了一下库房，为下一批搬运腾出地方。

这时我们清点了一下接下来要搬运的文物，有两个周转箱，12个纸板箱，30个左右的文物箱。这时候遇到的困难是文物箱怎么包装。因为个体较大，无法放入周转箱中。试验了几次，先用珍珠棉在上下面各包一层，再用打包机打包，但这种方式比较复杂，打包很慢。后来我们发现用纸板箱包装效果不错，剩下的几个文物箱都用了纸板箱包装。在这段给文物箱打包的过程中，我们自己运送了唱片。这些文物易碎，需要非常小心，自己运可以放心些。我们从新库房拿了空的塑料周转箱到档案馆。里面垫了很多层珍珠棉，小心翼翼的包好装好，用推车运下去，然后用单位的车子运到新库房，卸下来再运至二楼，这个过程也持续了多次，运来的唱片也是先暂时放到密集架存放，等唱片柜运来再做上架。

3月12日我们进行第五次搬运，因为搬场公司迟到，我们等了很久，到11



▲ 为文物箱打包

点钟，箱子才过来。我们先把周转箱里的东西拿出来，都是些棉织品，先放在了密集架上面两层。这些空箱子要再运回档案馆。这次搬家一共运了30个文物箱，2个周转箱，12个纸板箱，两个唱片橱。当天下午开始整理文物，两位同事理唱片，剩下的人员理书。书很多，任重道远。到3月18日，书籍总算全部上架完成。接下来开始做棉织品上架。尽管戴着口罩、手套，每次工作完成后，参与整理的工作人员身上都非常痒。因为年数关系，有些纺织品的总号都掉了，很难核对，我们又从藏品系统里将照片打印出来对照才算完成。这些东西上架后，清空的文物箱暂时堆放在密集架前后两侧的空地上，此时家具和地毯的托架也做好运过来了，为我们后面的搬运做好了准备。

每次搬运结束后都是新一轮的整理和清洁，宋庆龄收藏有许多红木家具和各式屏风，但是因为时间久远，它们都需要进行一次精心的保养。这次搬运前我们先将它们擦拭干净，然后用碧丽珠保养，让这些家具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一个梅花图案长椅和竹叶图案长椅花纹非常复杂，很难擦，我们两位同事分别花了2个小时才完成保养。因为这些家具和屏风还没有做帐，我和另一位同事开始做清单，她负责记录和拍照，我负责贴号。然后就是包装，用海绵纸将大部分家具盖住，用封箱带固定，写上编号。因为库房的位置实在是太过紧张，在搬运前，我们画了一个初步排

架的示意图。4月15日下午，第六次搬运装了两车。虽然之前设计过家具的位置，但因具体情况还是有一些变动。令人宽慰的是大的长条几总算放进去了，是先侧着进去再立起来的。红木坐榻和梅花图案长椅和竹叶图案长椅也放到了架子下面，较重、较高和易碎的家具都放在了下面，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为摆放得紧凑，一些椅子也能上架保存，是我们一开始没预想到。接下来要搬运的就是地毯和部分一般家具、电器了。一些小的电器像取暖器和电风扇我们都装了周转箱，一部分小地毯、一些零碎的用具，像康乐球桌，帆布床、灯罩等等也放入了周转箱。一部分可以挪动的地毯做了包装，剩下的一些实在是太重了，准备在车上铺垫子做保护。

4月25日下午第7次搬运，主要是搬运地毯、电器和藤木家具，依旧是两车。因为这次的地毯有些体量很大，档案馆的电梯又慢，导致搬运时间很长，直到3点钟才运来新库房。因为这次一楼、二楼都要放文物，所以三位同事先在一楼接收6个周转箱，我和另一位同事在二楼接收地毯和部分家具。因为不用开箱将文物取出，所以一楼的同事很快就上来支援我们。藤椅暂时先存放在托架二层。周转箱里的两箱未开箱。地毯卷好的直接上架，未卷的暂时放在一边等候处理。这次搬运最难的是7条未包装的地毯，有3条很重，放的时候搬运工人太用力了，一侧的架子垮塌了，只能等候



▲ 整理地毯

修理。整理的时候，电器和一些一般家具在一楼完成了上架。整理地毯的时候，先进行拍照再卷好上架，对一些没有做好账册的一般家具，这次也进行了拍照、量尺寸，做出了临时账册。5月14日上午进行了第8次搬运，将档案馆的一部分好的柜子运到二楼准备再装文物，一些一般家具运到了一楼存放。5月22日上午，我们把档案馆剩下的家具搬了过来。至此，档案馆库房搬迁基本完成。

经过2个月的努力，现在我们综合库房的文物搬迁也已基本完成。原来库房存放的大部分文物都没有包装，因此在搬运前要先做好囊匣。综库地方狭小，只能做好一批囊匣就搬运一批，争分夺秒，终于赶在7月底新库房全面消毒前完成全部搬迁。

整个搬迁的时间一直很紧，工作量又大，大家都很疲劳。文物搬迁是馆内重点工作，馆领导几次亲临现场指导我们的工作。负责后勤保障的同事帮我们采购各种包装用具，打包遇到困难时也会请他们帮助。在搬迁过程中，我们部

门主任的压力尤其大，上级领导一直催得很紧，但存在的困难非常多，她一直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推进工作。不管是档案馆库房还是新库房，地方都不算大，工作难以开展。搬迁的过程之中打包和上架要同时进行，对大家的体力都是一个考验，我觉得所有参与的同事都是好样的。虽然工作任务量很大，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尽量自己亲历亲为。可部门人员太少，女性和年纪较长的人又占了很大比重，整个搬迁一直是在身体疲惫的状况下进行的。搬运的过程中，每天要记住很多事情，带上很多东西，像箱子的钥匙，总号的贴纸，开箱工具，账本，封箱带等等，很多时候觉得脑子不够用，生怕忘带了什么，天天精神都很紧张。

但在这次搬迁中，我自己也收获了很多。从前期准备，到搬运期间部门之间的协作都有了直观体会，特别是自己全程参与了新文物库房的上架，全面了解了馆藏文物。以前只是看到照片，对文物没有很深刻的认识，现在对照实物，发现有些非常精美，如果可能的话，拿出来展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惜因为时间和能力所限，许多文物的深度信息还未被发掘，后续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因为搬迁需要，基本上所有的文物都制作了文物囊匣，对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也是非常大的推动。我想这次文物搬迁是我文博工作生涯中非常值得珍藏的一段经历，以后的工作也会受惠于此。

《最后的女皇

——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的诞生》

选译（连载）

译文 / 宫洁菁

11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美龄去广东拜访姐姐庆龄以及庆龄的丈夫，孙逸仙。战胜当地的军阀，废止军政府之后，孙正在建立与北京的政府对抗的革命政府，似乎是庆龄邀请美龄过去住一个月左右，帮她的忙。美龄跟爱玛解释广东“不像上海那么洋化，”又告诉她，孙山上的房子俯瞰

士兵的军营，我姐夫的士兵。我想下面驻扎了他们中的5000人。我们整天听到他们的军号声，还能看到他们在操场上操练……如果要进城的话，我们必须得穿过所有军营和总统府，很多人耐心地等在那里，想要采访孙博士……连接总统府和我们房子的是一条私人的隐蔽通道，像是一座天桥……两端都有卫兵，要有孙博士给的通行证才能通过！这条通道只有我们和我们的来访者使用。

和庆龄住在一起，更让美龄觉得自己没用，因为庆龄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丈夫的改革事业中去。“我想你是我朋

友和亲人中唯一一个可以让我吐露心扉的人了，我承认如果说要完成些有价值的事情的话，我过去那五年完全是在做无用功。”她1921年4月写信给爱玛。

……如果我真有决心的话，就应该克服和清除一切障碍，离开舒适的家，到内地去，“靠我自己的力量”做一些工作，离开那些知道我的家庭的人——尤其要离开上海，在这里，因为家庭的关系，我做的所有社会服务都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我以热心公益事业和有执行力而出名……我也被公认为“高智商”“脑子灵活”，对此觉得很骄傲又很高兴……但是由于我家族的地位，我有些脱离“普通民众”了……我穿得很漂亮，穿西式衣服，以汽车代步，不需要为了生计而教书……哦，大大，我怎么了？有时候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自我放逐，做一个基督教修女，放弃一切……过一种没有私欲的生活。也有时候，我想要结婚，了结所有事情，随波逐流，不让自己思考……你知道，男人看待人生的观点当然是和女人不一样的。或



▲ 宋美龄单人照

许他们暂时没有外遇，但最终一定会有的。我遇到过很多我以为很可靠的男人，其实都有这种事……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泛滥，这里的道德标准和美国区别太大了。

然而，一个月后，美龄被她的哥哥从南方“拽”回家，她写了封信向爱玛介绍“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她继续。

我非常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乘船离开香港的前一个晚上，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了他，尽管只是一起在船上呆了三天，我们还是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到上海的那天是他的生日；所以尽管离家三个星期了我还是花了一整天和他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我真高兴能在自己的人生中冲动一次。不用说，家里人对我大光其火……他们也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发火……星期六下午离开后，他马上就发来两个电报，诉说他有多想

念我。家里人想把电报藏起来，不过没成功……你知道我的家人有多保守，一定要维持“纯正”的家族血统，他们宁肯我死也不让我嫁给外国人。一般情况下我会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是——现在我在认真考虑是否接受另一个男人。我喜欢他；他是最成功的年轻人之一，有很好的家世，素养，教育背景等等。但我还在做思想斗争。你知道大多数时候，人们对于一个明智的建议会在理智上被说服，但情感上还是不能转过弯来……不过请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打算自己解决。同时，如果B先生去找你，一定要对他很好；可千万不要告诉他我跟你讲的事情。

夏天，炎热让美龄变得沮丧，她又陷入了低谷。“我知道，朋友们，亲戚们，认识的人们都嫉妒我，”她写信给爱玛。

因为他们觉得我拥有人生所需的一切好东西，一切需要的东西！……我的确是我的朋友中最有钱的。但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感恩，反而那么厌倦生活呢？……我试着去从事“社会服务”，或者“自我提升”，甚至“游手好闲”，事实上所有富裕、充实的生活能做的事情我都试了。可我失败了！！现在我要尝试一些新鲜的，至少对我来说是新鲜的……

大大你知道，我不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我实在太独立了，做不到很温顺，或者谦逊，或者惟命是从。也许你也知道，我的姐姐孔夫人，比我还要独立。她比我热情，是个很杰出的女性，并且善于交际——两三年前一直都是社交界的领军人物，她甚至否认上帝的存在，如果她在场的时候有人提到宗教，

她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坦率的说这只是旧式女人们无聊的行为，等等。但是现在，她变得很信教，她告诉我她之所以改变是因为她意识到了自己以前对待上帝的方式和态度是错误的。她说她曾经经历的那段时间比我现在还要痛苦得多，面对这些苦痛她求助于上帝——现在她找到了生命的慰藉和信念。我希望你认识她，因为她无疑是我们家最杰出的女性，她特别热情，机智，活泼，敏捷，而且充满活力。她绝对不是那种很狂热的人，但是她深深地信奉宗教，现在总是向上帝祈祷，帮助她解决问题。而且，她找到了平静，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平静……

她告诉我克服疲累的唯一方式就是信教，真正跟上帝亲密地交流。你知道，她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跟我这么建议。我以前总是会发火，因为她的话激怒了我，我总让她不要管我。但现在我尝试接受她的建议，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是否见效。但是我想说，自从听从她的建议，我真的快活起来了，祈祷的时候觉得好像不再是独自一个人背负重担。这样说吧，现在我乐于接受了。我无法跟你解释这一切；但我真希望你在这里跟孔夫人谈谈。你知道信教并没有改变她平时的生活方式，她还是很愉快，出去参加派对等，就跟从前一样，但是总有某个方面，变了。她不那么严苛了，思考问题更周全了，对别人的缺点也不是那么无法容忍了。

与上帝亲密交流最本质的一点就是相信上帝总是与你同在的。那些表象的东西，例如去教堂做礼拜，《圣经》什么的，只是帮助你更接近上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上

帝的爱是万能的……我希望你自己也尝试一下。我发现跟上帝交流的最好途径就是选择一首赞美诗，诗的意义完全符合你的需要的，然后诵读或者唱这些文字，直到它们渗入你的意识中去，这样你就会感到你的心灵已经准备好与上帝交流了；接下来，就开始祷告，就像跟你的父亲或者一个很亲密的朋友讲话一样。当然每个人祷告的方式都不一样；但对我来说，这是个好方法……这样我能强烈的感受到上帝的存在。

也许你会觉得我疯了，但是真的，大大，别的我什么都试过了。也许你认为我现在变得“伪善”了，但是不！此时此刻我正坐在我房间外面的阳台上，边给你写信边抽烟，我很享受烟草的味道。

12

尽管孙的顾问们力劝他不要去北方，他还是在1924年11月12日离开了，随行人员中包括颇具传奇色彩的侍卫双枪（莫里斯）科恩，加拿大来的小流氓，他最好的特质就是忠心耿耿地追随孙和庆龄。北上之前，孙，庆龄，还有他们奇怪的随从组合，在黄埔岛作了停留，在军校呆了一晚。陈洁如陪伴庆龄，蒋则在孙面前进行了一次正式的阅兵。临走之前，孙告诉蒋他要去北京了，“不确定”还能不能回来。事实是，孙感觉不是很好，一定已经猜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想趁着还有力气，开始他梦想了很久的北方考察之行。11月底他到



▲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北上途中

达神户，他这次去日本的重点是作一次演讲，呼吁同种族之间团结一致对抗西方，还提醒他的听众 1905 年日本战胜了俄国。庆龄也作了一次演讲，以妇女解放为题。日本政府忽视孙的到来，没有邀请他们去东京。

在去天津的路上，孙的病已经很严重了。12 月 4 日到达后两天，他被要求卧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终于到达北京，一开始他住进北京大饭店，然后搬进被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北京协和医院。1 月 26 日由外科主任医师为他进行手术，手术结果诊断为无法医治的肝癌。

两个星期前，还呆在北京打算下个月回家的爱玛·米尔斯收到美龄的一封信，里面附了封给庆龄的信，让她亲自转送。结果爱玛送完信就在那里和庆龄

一起用晚餐：“她（庆龄）认为（孙）博士好起来了，但是城里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认为他活不下去了，”爱玛写信回家。“……当然，我还没有见到他。他们有两个护士，还有所有的医生……美龄可能要过来，不过恐怕等我走了她都还没来呢。”

二月份爱玛回美国的时候，孙病得越来越重了。西医放弃之后，决定采用古老的中医疗法。由于在西式医院里使用中药不合道理，所以孙被搬到著名外交家，前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家里。顾在北京的宅子占地 10 多英亩，包括一个中西式结合的宫殿，以前住的是一个舞娘，她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岳父的情人。

病危期间，孙身旁有忠诚的庆龄，他成年了的儿子和女儿（他们的母亲不在），好几个政治方面的随行人员，包括鲍罗廷。在场的还有美龄和蔼龄，她们乘火车从上海过来。火车上没有食物，没有喝的，也没有暖气。水都结冰了。“我们又渴又饿，还很冷，”多年后美龄写信给一个国民党领导的儿子。“离开上海前，我们就知道这次旅程会危险重重，很难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到达北京。然而，我们是出于对总理的爱而去的，这是我们给予二姐物质和精神支持的一种方式。”

陪伴在孙病榻边的除了亲戚之外，还有老朋友和国民党的合作伙伴，他们听从鲍罗廷的指挥，决定把人们对列宁的偶像化崇拜作为一种模式让孙遵循。

始终让他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党的领导人在病重期间被鼓励给他的追随者写一些指示，其中包括一份广为流传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然后读给他听征询意见。据孙的姐夫孔祥熙说，“某一天我们觉得孙博士的状况好一点了，几个人就聚在床边，把遗嘱读给他听。孙夫人……跑进房间，开始哭泣。这使遗嘱阅读没法进行下去。但是我们必须有孙博士的签名。后来，孙博士虚弱得没法写字了，我们就叫孙夫人托着他的手腕签署遗嘱。”这个场面发生在1925年3月11日，第二天孙就去世了。

孙逸仙去世后，获得了他生前没能达到的地位——被美化为“革命圣人”。男孩子们以他为名，马路、医院、大学，甚至赛马都用他的名字。到处都挂着他的照片——家里，农舍里，办公室里，工厂里。他的照片被印成巨大的海报，粘贴在城市的墙上。就连他最后的遗嘱也被使用在一种类似宗教的仪式上，军营、工厂、集会的大厅里都举行这种仪式，参与者们脱帽聚在一起，对着他的照片三鞠躬，然后肃立，读文件。“过世的领导以前重复的话在被宣读，没有人讲话，甚至没人敢咳嗽，”一个看到其中一场仪式的记者说。宣读结束后，有三分之一的静默时间，让人“自我检查和揭露”，“思考信条”，“自己决定是否适合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就像一个观察员所总结的，“事实是，孙逸仙死后比生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意义更大。”

15

庆龄仍然拒绝改变立场或逃避。7月14日，她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

一切革命都必须……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孙博士……下了决心，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但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的疾苦的“革命”。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文章发表没多久就立即被停刊了——在此之前宋庆龄回到了上海莫利哀路的寓所。在那里，她继续谴责蒋介石政府——据西恩说，换了任何别的人这么做，都会招来“杀生之祸”。据说有一天国民党内一名并不得志的成员来拜访她。“如果你不是孙夫人，我们就把你的头砍下来了，”他阴沉地说。“如果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她笑着回敬，“不管怎样你们都会砍下它的！”宋庆龄的家里人不断施压让她加入蒋介石的阵营，她又没有办法阻止别人利用她丈夫的名义去粉饰反革命的行为，在决定去莫斯科之前，她度过了痛苦挣扎的十天。她

安排与一个名叫雷纳·普罗梅的美国朋友碰头，某一天凌晨3点秘密离开了。与她同行的还有陈友仁以及他的两个女儿，一辆苏联派出的火车在海参崴迎接他们去莫斯科。“我想她是最令人困惑的，”庆龄的朋友对她进行了一番评论。“我还没有确定革命对她来说真正意味着什么；是对她丈夫的盲目忠诚，或者她自身某些积极因素的推动。如果是后者，就有很多事情要克服，不爱抛头露面的天性，对所有哪怕只有一点不干净的事物的近乎病态的厌恶，包括东西和人，只热爱美好的事物。”

然而，从各种环境来看，据庆龄的一个摄影师（Sun Chang）所说，这是庆龄访苏“最不合适的时机”。为了与托洛茨基决裂，斯大林“严重的错误估计了中国的情况，在寻找替罪羊……可以是所有去过中国的人，或者与中国革命有关的人。”在庆龄之后抵达苏联的鲍罗廷，“被限制言论，还降了职务”，而苏联派去中国的使者，越飞，则自杀了。庆龄在中国的收入被切断了，她又不愿



▲ 宋庆龄在莫斯科车站受到热烈欢迎

意接受帮助，西恩说她现在是“最孤独的流亡者”。只剩下几个中国朋友的庆龄跟陈友仁一起去面见斯大林，斯大林敦促他们回国跟蒋介石合作。庆龄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在苏联停留了6个月后，她去布鲁塞尔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同盟”的一个会议，然后去了柏林。直到1929年5月她才回国。

28

一开始就打破家族团结的人是庆龄——先是嫁给孙中山，后来是扛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庆龄被认为是家里的美人，作家赛珍珠这么描述她“一个伟大的妇女……苗条但不瘦弱，”有着“细腻的皮肤，眼睛又大又漂亮，眼神真诚，轮廓美丽”“黑头发闪耀着光芒”。日本入侵前，庆龄一直都跟宋家其他人分开住——至少是这么公开的。虽然政见和经济背景不同，她和姐妹们的联系并没有减少。《国家》的记者Fandall Gould，描述了一个他在1930年初看到的场面：“我在孙博士莫里哀路的房子里等待……忽然门开了，三姐妹结伴进来……像女学生一样边笑边聊。这段时间孙夫人在被南京政府派出的便衣监视……夜里她家发出打字机打字的声音，有人便跟政府报告说是‘跟莫斯科联络的秘密电台’。然而，这就是她带回家的……她所反对的国民政府内两个最高官员的妻子。”

大约就是这段时间，宋庆龄开始和一个朋友邓演达合作，建立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另一个选择，因为两边她都不信任。后来邓被捕，受刑，被处死，庆龄发表声明谴责她的妹夫和政府。但当年轻记者伊罗生要“重审”跟共产党的关系，来跟她道别的时候，她告诉他“小心一点。我以为她是指当心国民党暗杀。但不是这样，她说，她是指我们的共产党朋友。我疑惑地看着她。‘是的’，她重复，‘当心一点。你不了解这帮人。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然而，引用埃德加·斯诺的话，庆龄“拥护革命，她依靠个人的力量营救了很多人。”但是，她没能救邓演达和鲁迅领导的六个左翼作家。据斯诺说，鲁迅是“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绝对不是共产党。即便如此，他和他



▲ 宋庆龄与邓演达等人在欧洲

五个追随者被迫挖一个大坑，手脚都被绑住，然后被扔进坑里活埋。^[1]庆龄说，“那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大元帅——活埋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显然他学习《圣经》还学没到科林斯的程度。”

少数幸运一些的囚犯被关押在渣滓洞，一幢小楼，曾经是个煤窑，离重庆大约一小时路程。16个男囚室2个女囚室，墙上有一些训诫，譬如新生活运动的四个好处等，企图让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悔改。为了鼓励人变节，那里还保留了一个行刑室，里面有一个大椅子，一个实行绞刑的装置，一个火盆，各种各样的刑具，棍子，钩子等等。

作为蒋的妻姐，庆龄总是高不可攀，然而她常发表文章反对她妹夫和政府。她搬去香港一个小公寓，1938年发起了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救济组织成了解放区物资的主要来源。“她给我们的东西里有制造盘尼西林的原料和配方——当时在全世界来说都是领先的，”一个美国医生充满感激地说。据为她写传的Jung Chang说，庆龄为了救济工作卖掉了她母亲留给她的首饰。“对她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战争中的穷国家，奢侈是一种犯罪。”张说。“在这方面她与她那过分奢华的妹妹蒋夫人划清界限。”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庆龄才重返家庭，公众可以看到或者拍照拍到她和她的姐妹们在一起的场面，而且，尽管她没有改变对蒋介石的看法，还是愿意偶尔跟他合个影。



▲ 宋庆龄与蒋介石及姐妹

32

日本人袭击珍珠港的时候，美龄的两个姐姐都在香港。双枪马坤试图让庆龄立即离开这块英国殖民地，可是庆龄拒绝了，说“如果这里有战争”她可以帮助难民。日本空袭香港后，马坤又劝她离开，解释说她必须知道“她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的女英雄”，如果她留下，很多人会因为要救她而死去。这次她同意“一旦有飞机”马上就走。尽管英国坚持了17天没有把香港放弃给日本，子文还是很担心庆龄。“二姐在哪？”12月8日他发电报给美龄。“请立即答复。”当天又发了第二封电报：“香港很危险。晚上你能设法派飞机去营救二姐吗？期待你的答复。”

在英国投降前庆龄得以离开香港。“要不是蔼龄姐姐碰巧也在香港，是不可能那么快出来的，”她一个月后写信给子文。“……我们乘坐后一班飞机

逃走的，在机场从夜里12点等到第二天凌晨5点，每分钟都可能被炮弹、炸药炸死，我们周围的战火非常猛烈。机场里六架被毁的飞机和两个弹坑在提醒着我们这是多么冒险的事。九龙跟港岛之间没有渡轮。只有那些持有特殊的军人证件的人才能上船。所以直到8号夜里灯火管制的时候，我才在中央银行的P. N. Chung的帮助下到达港岛，Chung为了救我冒了很大的生命危险。”

姐妹逃离香港之后，关于蔼龄的一个糟糕的故事在重庆传开了。一辆特殊的飞机被派去营救她和她的随从，包括她妹妹。登机的时候，蔼龄坚持要带上她最喜欢的宠物，一条达克斯狗。飞行员答复说飞机已经超重了。蔼龄居然就让她一个保安留下，以致这个可怜的男人被抓住，杀害。一条小狗的重量不可能危及到一架飞机，所以飞行员一定是非常讨厌孔夫人，想要毁坏她的名誉。这个故事有另一个更糟的版本，是Joseph Alsop讲的，他声称蔼龄的狗



▲ 宋庆龄与宋蔼龄

——一只“巨大的，肥胖的”动物——占了他在航班上的位子，导致他被留在香港，被日本的监狱拘留。第三种说法，据一个住在上海的美人说，蔼龄，一个“强硬，贪婪”的女人，在离开香港的最后一架飞机里装满她的家具，而弃她的佣人们不顾。不管这些故事是真是假，当姐妹们到达重庆时，就像庆龄所说的，“一篇中伤人的社论指责我们携带了大量行李，七条喝牛奶的洋狗，还有一大批佣人。事实是我们的飞机上有23个人，这样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多少行李，我想对那篇社论作回应，它写的很狡猾，没有点名但直指我们，不过人家让我保持有尊严的沉默。同时，谣言四起。蔼龄姐姐说她受到太多指责，现在她都不在乎去澄清那些谣言了。我连我的文件和其他重要的文章都没办法带上，更别提我的狗和衣服了。”

到达重庆后，庆龄搬进了蔼龄的大房子——30年代为一个有四个情妇的将军建造的宅邸，由四幢独立的建筑组成。庆龄在那里住到1943年初，子文为她安排了一处政府的房子。一幢普通的两层楼房，里面有个小花园，下面有一个下



▲ 宋庆龄在重庆寓所

水道，上面有座木桥。配有防空洞。重庆的防空洞被划分成各个不同等级——给农民的，给城里人的，给官员的，依次类推——但庆龄邀请她所有的邻居跟她共用这个防空洞，不管他们是哪个阶层的。她和她的两个姐妹有私人的通话线，直接连到她们家里，战时在重庆她们常常通电话。



[1] 此处不符合史实，为错误叙述。鲁迅于1936年10月因病在上海去世。

■上海武警总队政委马荣辉参观宋庆龄故居



1月1日下午，上海武警总队政委、党委书记马荣辉少将在武警三支队政委刘钢等领导的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

■湖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许云昭参观宋庆龄故居



1月3日下午，湖南省政协党组副书记许云昭一行，在湖南驻沪办领导的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

■宋庆龄诞辰120周年纪念片《底片》在上海纪实频道播出

今年1月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作为系列纪念活动之一，宋故居在市孙宋文管委的支持、协助下，聘请了上海纪实频道《往事》栏目组负责纪念片的编剧和摄制工作，于2012年底，完成了纪念片拍摄任务。

该影片以宋故居馆藏的一张玻璃底片为切入点，以讲述“文物故事”的形式，纪录了宋庆龄与孙中山共同走过的革命道路和光辉历程，展现了宋庆龄从一名孙中山的助手成长为独立坚强的革命者的光辉事迹，向世人昭示了她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

纪念片《底片》分别于1月24日至25日晚8点30分在上海纪实频道播出(上下集)。

■宋庆龄故居举办《优雅·时尚——馆藏宋庆龄服饰展》



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20周年，由我馆主办的《优雅·时尚——馆藏宋庆龄服饰展》，于1月28日在宋庆龄故居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30余件宋庆龄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穿戴过的服装和饰品，其中一件最具代表性的列宁装，是新中国成立后服装界的一种潮流和时尚，宋庆龄曾经穿着它主持、参与了许多国务活动，出席很多重要场合。还有她年青时穿着过的、最能体现她着装风格的各式旗袍，也有她年迈时穿过的宽大便装等，时间跨度长达50余年。同时展出的还有宋庆龄曾经戴过的首饰、手表，以及她用过的一些化妆品。这些服装和饰品，展现了宋庆龄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宋庆龄故居开展“邮寄幸福”妇女节活动



3月8日，为庆祝三八妇女节，当天前来宋故居参观的每一位

妇女同胞都获赠一张加盖有宋庆龄手迹“Thinking of you”和“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留念”纪念章的明信片，并设立了专门投递箱，让观众将写好地址的明信片投入箱内，由故居统一进行邮寄。这一“邮寄幸福”活动受到了女同胞们的热情欢迎。活动当天，宋故居共接待游客438人，较去年同期增长93.8%。

■宋庆龄故居积极构筑“三公里文化服务圈”

近期，市委宣传部、市教委等联合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同缔结“三公里文化服务圈”公约，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积极响应，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服务活动。

自今年3月起，结合纪念宋庆龄诞辰120周年，宋故居向周边十四个“宋庆龄班”所在学校推出了《宋庆龄在上海》、《唯菊与石 品质高洁——宋庆龄的高尚品格》两个主题宣讲。此外，宋故居还向周边社区居民，尤其是党员推出了《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主题宣讲，受到周边社区居民、党员的热烈欢迎。

■甘肃省委政法委书记罗笑虎一行参观宋庆龄故居

4月11日下午，甘肃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罗笑虎一行在甘肃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张旭中副主任的陪同下，前来上海宋庆龄故居参观。

■新书首发式暨《同志·朋友·亲人——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一家》文物图片展开幕仪式在宋庆龄故居举行

5月29日上午，《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



缘》、《宋庆龄在上海》首发式暨《同志·朋友·亲人——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一家》文物图片展开幕仪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隆重举行。

仪式由馆长金晓春主持，秦量副主任、李湄女士致辞，邓广殷先生、刘亚军先生、高志青先生分别介绍了《永不飘逝的记忆——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宋庆龄在上海》和《同志·朋友·亲人——宋庆龄与廖仲恺、何香凝一家的情谊》文物图片展的编撰、创作和内容概况。胡祥郁、马玉成、董玲、孙显良、邹竑向共建单位和宋庆龄班的代表赠送了新书。相关单位的领导和代表共90余人出席了仪式。



主 编 金晓春 董 卫
副主编 刘世襄
执 行 王宁宁

主办单位：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
邮编：200030

电话：021-64718833
传真：021-54654810
网址：www.shsoong-chingling.com

内部发行 免费交流